

人生借鉴译丛

Sechziger

名人六十耳顺

[德] 格哈德·普劳泽 著

《时代》周刊著名专栏作家真诚奉献！

中华书局

「人生借鉴译丛」

Sechziger

六十耳顺

为什么卓别林六十岁后再也没有回过美国？马克·吐温是怎样成功的？毕加索最害怕的是什么呢？

亲爱的读者，不管你是男是女，不管你年龄几何，都将在这些表达和描述里发现自己，找到自己的问题和境况。因为从根本上说几乎一切都已经被其他人经历过，遭受过，期待过，畏惧过。

著名的《时代》周刊《谈天说地》专栏主笔格哈德·普劳泽对这一类问题作了探讨，在讲述的过程中尽量让名人自己来谈体会，而且尽可能详尽。

ISBN 7-101-04369-0



9 787101 043693 >

定价：13.00 元

责任编辑：王瑞玲
封面设计：毛樟

《人生借鉴译丛》

孔德明 印芝虹 主编

六十耳顺

[德] 格哈德·普劳泽 著

[德] 曼弗雷德·B. 梨木若特 图

徐央央 译

印芝虹 校

中华书局

**Sechziger.Ein Geschenk für alle zwischen 60 und 70 by
Gerhard Prause**

Copyright © 1983 by Gustav Lübbe Verlag GmbH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京图字:01-2002-332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六十耳顺/(德)普劳泽著;徐央央译.-北京:中华书局,
2005

(人生借鉴丛书)

ISBN 7-101-04369-0

I.六… II.①普…②徐… III.人生哲学-通俗读物
IV.K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7651 号

书 名 六十耳顺

丛 书 名 人生借鉴译丛

著 者 [德] 格哈德·普劳泽 [德] 曼弗雷德·B. 梨木若特 图

译 者 徐央央

责任编辑 王瑞玲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5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87×960 毫米 1/32

印张 6¹/₈。 字数 72 千字

印 数 1-5000

国际书号 ISBN 7-101-04369-0/I·576

定 价 13.00 元

前 言

小的时候,人们渴望自己尽快成长,以便早日长大成人。但长大后,即便才二十多岁,大部分人就想推迟年龄增长以及后来成为老人的过程。没有人愿意在二十六岁时就被算作三十岁的人,即使到了二十九岁也还是不愿意;但在十年之后,也就是三十九岁的时候,大家却愿意说自己仍属而立之年。这种情况发生在所有的年龄段,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岁的人同样如此。

可见数字会对人产生一种很大的心理影响,几乎没有人可以逃脱。尤其是生命年轮中的整岁数,它们让人感觉是一个跳跃,一个深刻的变化,但同时也给人以欣慰,庆幸自己毕竟达到了这个年龄,因为这并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情。逢十的整生日给人们提供了契机,去感激和总结,去回顾过去十年,也去展望未来十年,去祝福自己以及享受别人的祝福。庆祝生日是一个古老而又美丽的习俗。

“人生借鉴译丛”向大家讲述古往今来著名的或人们所熟知的人物在某个年龄段的种种境况遭遇:他们的生日是如何度过的?他们生理心理状态如何?经历过什么?有何规划以及有何行动?他们曾有过什么样的困惑?他们是否幸福?对未来还有着信仰,还是早已灰心断念?在讲述的过程中尽量做到让名人自己来谈体会,而且尽可能详尽,为此我引用了他们的信件、日记或自传里的一些文字。因为他们自己的表述最能说明他们期待什么,他们担忧什么或者他们为什么而高兴。

亲爱的读者,不管你是男是女,不管你年岁几何,都将在这些表达和描述里发现自己,找到自己的问题和境况。因为从根本上说几乎一切都被其他人经历过、遭受过、期待过、畏惧过,包括衰老这惟一能够延长生命的现象。同

时，以整个生命长河为背景来观察某个特定的年龄段，人们会不断地认识到许多意想不到的东西。比如，只有在这种时候人们才会明白——这对于某些人来说可能是一种安慰——即使伟人、名人和成功人士也会一次次陷入茫然无助，甚至绝望的境地。然而，读者看见，生活又继续前行了，并且往往就在这时，柳暗花明又一村，幸福迎面走来。

格哈德·普劳泽



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1483—1546

“谢天谢地我们依旧精力充沛,身体健康……如果上帝愿意,我们准备启程回家了,阿门!”

把您的心事抛给主

——路德

马丁·路德：16世纪欧洲宗教
改革运动发起者，基督教新教路德
宗创始人，公布《九十五条论纲》，
将《圣经》翻译成德文。

“上了六十岁的人，如果早上醒来身上没有任何不适的话，那他肯定已经死了。”这是外科大夫奥古斯特·比尔(1861—1949)的看法。他曾在柏林大学教书，为战争中的士兵设计过护头的钢盔。比尔还写了一本关于身体——心灵问题的书：《心灵》，很为人称道。写完这本书的时候，他七十八岁。根据自己身上实验的结果，奥古斯特·比尔开创了脊柱麻醉法，这是他一生最大的贡献。他对年届六旬者疾患的了解，很可能基于对其病人的观察，同时也来源于他自身的体会。但据说这位几乎活到八十八岁的老人在六旬的时候似乎还从来没想到过死。

马丁·路德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四十岁的时候他就认为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但同时应该补充说明的是,路德并不害怕死亡和死亡的过程。马丁·路德是艾斯莱本人(属图林根地区),出生于1483年11月10日。在他六十多岁时,当地的女选帝侯,也就是他的邦君,关切地询问他的身体状况,路德的回答在我们今天听来多少有些不舒服:“这个年龄已经到来了,它本身意味着年老、冰冷、走形、疾病和虚弱;瓦罐汲水,直至破碎;我活得够长了,愿上帝赐给我极乐的一瞬,让这一滩腐朽无用的肉体囊袋回到土地下它的家族中去,由那些蠕虫们分享。”

今天,五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走进了一个理直气壮拒绝将死亡排挤出意识的时代,路德的话听起来就难免有些阴郁了。可在他那个时代情况是不一样的。那时流行老的基督教观念(这种观念现在还存在),即人在死后才开始真正的永久的生活。正因为这样,在路德掀起宗教改革之前,生日一直都没有成为庆祝的原由。相反的,人们却隆重地庆祝命名日,至今在信天主

教的地区还流传着这种习俗。命名日是某个圣人的日子,以他的名义某人受到了洗礼。但是跟圣人的日子有关的不是他们的生日,而是他们的忌日。

这要追溯到早期基督教时期教会作家所持的观点,尤其是奥利金的教义。奥利金被认为是基督早期最著名的学者之一,他告诫人们,要把世俗的生活看成一种虚无和一种空洞的假象,看成一段幸亏很短暂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因为原罪而受罚,人的原本属于上帝的灵魂,被捆绑到我们的肉体上。只有死神才可以从人的肉体中拯救出这个灵魂,让它回到上帝那里,重新获得原本而又真实的生活。根据这种理论,忌日不是结束,而是开始,是再生到基督的生活中去。因此忌日不是悲伤的时候,而应该成为高兴的理由。

生日则相反,它在奥利金的教义中标志着人们开始踏进尘世,应该引起人们的悲伤,他以耶利米和约伯为例,这俩人都诅咒降临到这个世界上的日子。他认为每一位圣人都与他们感

同身受。只有罪人才可能视生日为快乐。

年长一点的教会作家德尔图良也持同样的观点，他大声呵斥风靡整个罗马帝国的皇帝生日宴会，在这些宴会上皇帝大摆排场，而平民百姓则对这些尘世的统治者表现出近乎对神灵般的敬畏。德尔图良告诫基督教徒，要远离这些庆典，因为把世俗的统治者神化是与基督教教义相悖的，基督教只信一个神。

德尔图良斥责皇帝生日庆典是“毫无意义且胆大妄为地向皇帝宣誓效忠”，除了皇帝的生日之外，基督教徒们不久也排斥了所有其他人的生日。人们不再庆祝生日，而是去庆祝命名日，也就是圣徒的忌日。出生把人们带进了原罪的泥潭，这是由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引起的，它剥夺了人们肉体不死的权利。只有死亡才可能把人们从原罪中解放出来。不受原罪牵连的只有圣母玛丽亚和基督耶稣，因此他们的生日令人高兴，而且每年都庆祝一次。另外人们也可以照常庆祝施洗者约翰的生日，因为约翰在母体里的时候就已经被奉为神明了。

与此同时，长远受到奥利金思想影响的天主教教堂却从未有过禁止庆祝生日的明文规定。然而，曾经倍受希腊人和罗马人喜爱的生日庆典作为跟天主教命名日庆典的有意对抗，还是首先在新教地区开禁的。但是命名日和生日之间的原始对立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淡化了。今天，在许多天主教地区，人们同时庆祝这两个纪念日，而几乎不再有人去想，其中的一个原本是个忌日，基督教徒只该为这个日子而高兴。尽管基督徒们渴望在彼岸有原本而又真正的生活，但是他们也希望能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尽可能长久，尽可能舒适。

真的要把死亡看作高兴的理由，这在于路德也是很难接受的。这一点可以从路德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看出，信写在路德十三岁的女儿玛格达莱娜夭折之后。这时的路德已走到了生命的第六十个年头。从他对玛格达莱娜之死的悲伤里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前面路德所说的话：“我已经活得够长了”，话语中无疑带有心灰意冷的色彩。在他亲眼目睹玛格达莱娜去世三天

之后，他写信给多年共事的好友尤斯图斯·约纳斯：

“我想，关于我最可爱的幼女玛格达莱娜超度到了基督的永生之国一事，你可能已略有所闻。这是一个幸福的结局，一种极乐的死，她终于逃脱了肉体、尘世、虚幻和鬼怪的控制，为此我和我的妻子应该感激和高兴才对，但是父母是如此深爱着自己的女儿，以致于我们无法眼睁睁地看着她离去而感觉不到心灵的抽噎和呻吟，感觉不到内心极大的悲伤。因为我们活泼可爱、听话懂事的幼女活着时和临走时的一切特征，她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已深深地烙在我们的心头，所以尽管她的死是升入基督王国，是无与伦比的死，那也无法彻底驱走我们的悲伤，像它原本应该做到的那样……”

路德受到的打击确实很大，后来他只能求助于他的朋友：“请你代我们向上帝致谢”，在那段时间里他显然是无法亲自去感谢上帝的。仅三年之后，在1546年2月18日，路德自己也去世了，享年63岁，不是死在家中妻子的身旁，而

是死在他的出生地艾斯莱本，他是在三个儿子的陪同下去那里进行谈判的。他留下的最后的笔迹是用拉丁文写的，他的遗言，一直到最后两句话，再次显示了他不凡的谦虚和人道，而这始终是他果敢和随时挺身而出的人格的一部分：

“一个人如果没有亲自当过五年的牧人，他就不能够理解在诗作《牧歌》中的维吉尔，即诗人本人。一个人如果没有亲自当过五年的农民，他就不能够理解那个《农事诗》中的维吉尔。在其《书信》里面的西塞罗是没有人能够完全理解的，除非他有在一个杰出的国家政体中从政二十年的经历。没有人可以信口雌黄他已嚼透了《圣经》，除非他跟先知先觉们，如以塞亚和耶利米、施洗者约翰、耶稣和耶稣使徒们一起管理了教区达百年之久。不要试图与那神赋的埃涅阿斯并驾齐驱，而只是跟随着他们的足迹深深地祈祷。我们是乞丐。这是事实。”文末他还注上了日期——他的再生日：公元 1546 年 2 月 16 日。

虽然路德四十岁的时候就认为自己很快就

要离开人世了,这时他的死却来得出乎意外。可能冬日里的艾斯莱本之行把他累倒了,他此行的目的是去调节与曼斯费尔德伯爵之间的一场家庭纠纷,结果调节成功了。流传下来的说法说路德步行了一段路后身体发热,后来又在刺骨的寒风里着凉了,冷热不济,所以病倒了。他早就患有结石病。而现在又开始犯头晕,而且是经常发作。所以当他和儿子们想打道回府时,他已没有力气走出客栈了。但是六旬的路德并没有感觉疲惫,没有对他的事业,也没有对他的信仰疲累,没有厌倦生活。这一点,他在途中给妻子的信件也可以作证,信中有很多充满爱意的调侃,因为他家中“亲爱的家庭主妇”,他维腾堡的“大夫太太”,用他的话说,实在是对他担心得太多了。他在2月10日的回信中写道:

“最神圣的博士夫人!我们十分友好地感谢您给予的巨大关怀,真抱歉,这种操心竟使您夜不能寐。自从您为我们担忧以来,客栈里的火就堵在我卧室的门前,折腾着我们,而昨天——不容置疑是在您忧虑的魔力下——一块石头差点

掉在我们的脑袋上，几乎把我们像夹在捕鼠器里一样地碾碎：我们秘密的居室里老有石灰和粘土洒落在我们头上，差不多长达两天，直至我们找人来帮忙；而当他们用两个手指触摸这块石头时，它滚了下来，像一个长枕，有一只手那么宽；如果没有天使的看守，这块石头就要来感谢您的圣心了。我担心，假如您再不停止担忧的话，泥土最终会把我们吞噬，所有的自然力都会来追剿我们。您难道是这样学习基督教教义的吗？祈祷吧，让上帝去操心；上帝没有旨意要您为您或者为我担忧。在《圣经》许多地方都写着：‘把你的心事抛给主吧，他为您担忧。’”

结尾时他还补充道：“谢天谢地我们依旧精力充沛，身体健康……如果上帝愿意，我们准备启程回家了，阿门！”



腓特烈二世

Friedrich II

1712—1786

“我依然要为荣誉而奋斗，哪怕是在奋斗的过程中死去。”

为荣誉而奋斗

——腓特烈二世

腓特烈二世：又称腓特烈大帝，普鲁士第三代国王(1740—1786)。在摧毁神圣罗马帝国和领导统一德意志方面起过重要作用。

腓特烈二世 1712 年 1 月 24 日出生于柏林，到六十岁时，他已将普鲁士的疆土扩大了七万平方公里。他多年的笔友，七十七岁的哲学家伏尔泰向这位六十岁的普鲁士国王表示祝贺，话语间充满了洋溢的热情：“您屹立在那里，我的殿下，作为一个强有力政权的建立者，您手里托着的是欧洲这架天平的一个秤盘，而俄国正成长为另一个新的世界。世事变化实属难料啊！我能够经历这些重大的事件是多么地幸运呀！天哪，早在 30 多年之前我就预言过，您肯定能够成就一番大事业；然而我的预言并没有能够企及您在整个世界远播的声名；让世界震惊已

经成为您不间断的使命；我不知道，您何时会停歇；但我知道，普鲁士的雄鹰会大鹏展翅，越飞越远。我恳请这只雄鹰，在天空翱翔时向我这可怜的身影投下一注目光，使我暗淡的心灵恢复生机。”

为纪念 1772 年部分波兰区域划归普鲁士，腓特烈二世让人铸制了印有他头像的纪念币，并送了一枚给伏尔泰。为此伏尔泰写道：“如果这枚硬币和您相像，那么我可以从您的目光和您的脸上找到生命的气息和火热的激情，找到一位英雄充满力量的强健。我将依旧像三十年前那样对您五体投地，只是已经变得虚弱无力了……”

腓特烈二世的回信非常的清醒：“您必须知道，我从来不让人给我画像，因此无论我的肖像还是我纪念币上的头像都不会与我相像。我已经老了，起皱纹了，患痛风病了，岁月压弯了背，但我始终开朗，总保持着好心情……”随后，这位上了六十的人在哲学家面前表现了一种大度和谦虚，把自己在政治上所取得的成就降低到

一种稀松平常的水平：

“我该怎样使您重新变得年轻呢，您，不朽的您！太阳神阿波罗已把统治帕纳塞斯山的节杖交给了您，并且为您而退了职。您的诗句依然洋溢着您生命的春天，您的理智则透着秋日的气息。谁能把理智和幻想结合在一起，谁就是幸福的！这比夺取了几个外省更重要，因为它们在我们地球上的存在几乎是难以觉察的，而从天外来看，它们甚至比不上一粒沙子。——我们这帮政治家不得不陷身于其中的就是这些可怜的东西。我为自己感到羞愧……”不过，六十岁的腓特烈二世接着还是补充道，他的这次国土扩展未经一枪一炮：

“请您注意，整个事件的过程中没有流血，百科全书的撰写者不会叱骂‘被收买的强盗团伙’或者采用其它我从不为之所动的漂亮说法。一支笔和一点墨水就把一切都摆平了，同时欧洲赢得了和平……”

然而他还是有所顾虑的：“至于未来，我不想为任何事情作担保。回顾历史长河，我发现，



十年之内就必有一场战争爆发。这种战争的狂热可以压下去,却永远无法治愈。究其原因,我们只能归咎于人类天生的不安分了。不是这一个引发了混乱,便是那一个,而一点火星常常就足以引发一场蔓延的大火。”

腓特烈二世年届五十的时候就觉得自己老了。而他也确实是百病缠身,很早就受痛风的折磨。1773年10月9日他从波茨坦写信给伏尔泰:“我很遗憾地发现,您离开这里已经二十年了。您以为,我看起来还是当年那副模样。而假如您见到我,您是找不到那个看上去喜欢跳舞的年轻人了。您看到的只是一个老态龙钟、体弱多病的白发老人。每过一天我的生命就消耗一点,在不知不觉中我慢慢地走向生命的最后一个去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够汇报那里的情况。”

腓特烈二世经常抱怨年老带来的病痛,但同时也不时地强调,他并不眷恋生命。在这封信里也是这样,他接着写道:“观察人类的学者认为他们发现了一个事实,即大部分军人在年老

的时候爱喋喋不休，相比之下作家更会养精蓄锐。伟大的科德、马尔博若、欧根王子都经历了他们的思维一步步随着身体的衰弱而崩溃的过程。我也可能遭遇到同他们一样的命运，尽管我并不具有他们的天才。另一方面我们知道，荷马、阿提库斯、瓦罗、佛特奈尔以及其他许多人都活到了高龄，却并没有感到同样的老年病症。但愿您会得到上帝的恩赐，在高寿和精神方面都超越这些人；我不想去操心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我，不想去担心能否多活几年，在永恒面前这几年全然无所谓。”

年过花甲的腓特烈二世也许不眷恋生命，但他肯定还眷恋着荣誉。年轻时，他入侵西里西亚后，写信给伏尔泰，谈到了战争中的各种事务，他“愿意把这一切事都留给另一个人来做，如果不是一种幻象、一种叫作荣誉的东西，老在我头脑中徘徊的话”。进入六旬后他再次写信给伏尔泰：“尽管这样，我依然要为荣誉而奋斗，哪怕是在奋斗的过程中死去。因为六十一岁的人已经无可救药，而且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谁

不去争取同代人的尊重,谁就不值得他们尊重。这是我本质的真诚坦白,我这样,是造化的意愿。”

腓特烈二世作为普鲁士的国王统治了整整十二年,直至1786年8月17日在无忧宫中逝世,享年七十四岁。对于履行其国父和强大的军队首领的职责,他至死都决没有过一丝一毫的懈怠,而同时他也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兴趣爱好。在这些年里他也从事写作,其中有两篇是关于历史的表述:《胡贝土斯堡和约直到波兰分裂终结里值得深思的问题》和《巴伐利亚争夺王位继承权的斗争》。

为数众多的腓特烈二世的传记实际上都是以他从七年战争中返回家乡作结的。腓特烈二世的六旬人生在历史记载中只是提纲挈领式地一笔带过。要作英雄颂歌,这位国王所做的和平工作显然是太无聊,太日常了,但事实上,它们的重要性即使不比他的战争成果大,也并不逊色。所以在这里还要引用腓特烈二世写给他的朋友伏尔泰的一封信,信中讲述了他进行的几

个农业项目, he 把它们称为“特利普托勒莫思耕作法”, 这是从特利普托勒莫思, 埃莱夫西斯城国王科列的儿子那儿来的, 据说他发明了犁和耕作技巧:

“我万分感谢您给我寄来的种子。谁曾料想, 我们会有一天在信中谈论特利普托勒莫思耕作法? 会讨论到我们俩谁的田耕种得更好这样的问题? 然而, 农业的确在所有行业中位居首要, 没有它既不会有商人也不会有朝臣, 既不会有国王也不会有诗人和哲学家。真正的财富是由土地里生产出来的。改良农田, 开垦荒地, 沼泽地排水, 我称之为夺取; 这样, 如果拓荒者们结婚, 想要生儿育女, 我就可以给他们提供生活必需品, 让我们勤劳的人民越来越壮大。

“我们按照英国人的方式建造了人工牧场并取得了突出的成果, 我们的牲口数量已经增长了三分之一。但是他们的犁和播种机却没带来相应的成效; 用犁的效果不好是因为我们的部分土地太松了, 而播种机的问题是它们对农民和农村人口来说过于昂贵了。

“但同时，我们成功地在自己的园子里种植了大黄茎；它没有丧失自己的各种特性，口味跟我们从东方引进的大黄茎毫无区别。

“今年我们收获了 5000 克的蚕丝，并把养蜂房的数量扩大了三分之一。

“这是我这把年纪还能做的事，也是我还能享受到的乐趣……”

当时，这位“无忧宫中的孤独者”还不到六十四岁，从最后一句话中不难看出，这里面也有某种无奈。这种无奈至少部分源于他糟糕的健康状况。尽管如此，他决不垂头丧气；仅有一条就能使他坚持下去，那便是他确信，对于他的死，别人只会感到幸灾乐祸。1776 年 9 月初他写信给伏尔泰：“去年冬天我病了；不过康复之后，我又觉得像先前那样有精神了。可能有些人会认为我活得太久了；他们怀疑我是否健康，对我的身体总是议论纷纷，好像他们希望我会因此很快——如他们所期待的那样——走向黄泉路。”

那时腓特烈二世六十三岁，用现在的标准

来看还根本算不上老。在同一封信中他继续写道：“我决不顾惜自己的方法是始终不变的。一个人越是保养自己，他的身体就越虚弱和娇惯。我的职业要求我不停地工作和行动。我的身体和我的精神必须听从这一职责。我并不一定要活着，但看来必须要行动。在工作的过程中我总是感觉舒畅。”

但是作为六旬之人，腓特烈二世显然已经不能不去思考年老、疾病和死亡。

六十四岁时，他甚至把自己的哀叹作成了一首诗寄给伏尔泰：假如伏尔泰还会再访无忧宫的话，他只能在那里找到一个“老头子”了：

……迟钝，沉默，心冷；

偶尔他开口说话，

即刻人人哈欠连声。

不再当年妙语连珠

伴以风趣优雅，

不时让快乐时光

不知不觉中悄悄流淌，

如今已经别无名堂

除去政治和最晦涩的形而上。
 听起来如此无聊
 仿佛某本现代小说的味道。
 从前一蹦三尺，如今拄杖挪步，
 曾经充满力量和生气，而今等同破烂和
 补丁！
 啊上帝，时光就是如此无情！
 仿佛温和的蔡菲汝斯
 把主宰广阔的空气王国的权力
 不得不交给北风
 于是世界如同死去：
 枯萎和荒凉笼罩着大地，
 树木索立着，无枝无芽，
 花园光秃着，无叶无花，
 带着微微的颤抖人们感觉着
 时间的双手夺走他的年华。
 年轻的时光在迷误中消逝。
 几乎还没学会辨识，触角也尚未敏锐，
 那疲惫却已来，那痛苦也已来，
 并且不会再有多久，就到了时辰离开。



伏尔泰

Voltaire

1694—1778

“……在阅读您的著作
的过程中人们不禁会兴致
勃发，试着四肢着地去爬
行。”

用四肢爬行的兴趣

——伏尔泰

伏尔泰：原名弗朗索瓦-玛丽·

阿鲁埃，法国启蒙运动的导师和精

神领袖。既是哲学家、历史学家，又

是诗人、戏剧家和小说家，著有《查

第格》、《老实人》、《哲学书简》等。

腓特烈二世给伏尔泰写哀叹诗行时，伏尔泰已经八十二岁高龄了。腓特烈二世似乎很清楚地觉察到，伏尔泰衰老的速度比自己慢。在诗句后面他添加了下文：

“所有这些变化会发生在普通人身上，但不会发生在神圣的伏尔泰身上。他就像萨拉夫人，160岁时还能把阿拉伯的小国王迷得团团转。他的精神不是在衰老，而是变得越来越年轻。”——至于自己，腓特烈二世则早在两年前就认为：“我诗的血脉已经枯竭。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像您那样长生不老的幸运……就我而

言,我已把部分记忆力和本来就有限的想象力,连同我的双腿一起送到了考翠图司河岸(希腊神话中的一条阴间的河流。)……”

在他的文字和信件里,并且作为企业家(他也曾作过的),八十多岁的伏尔泰的确显得与疲倦和衰老毫不沾边。1694年11月21日伏尔泰出生于巴黎,年上六旬他还开始尝试完全新的东西,几乎是一种全新的生活。在柏林和波茨坦腓特烈二世的王宫里住了将近三年,最后以两人反目而告终后,他因为回不了巴黎,便与他的侄女玛丽-路易丝·德尼一起定居到了日内瓦。由于他写过许多过于激烈的文章,巴黎视其为不受欢迎者。

经济上他没有任何担忧;很早的时候他就发了一笔财,并妥当地处置了这笔财富,使之生利。后来他花了巨额资金购买了一栋带有一个大花园的乡村别墅,从那儿可以望见日内瓦湖泊和阿尔卑斯山。他把这座豪宅称为“无限欢乐”。另外他还在邻近的洛桑买了两块地皮。然后写信给他终生的挚友克洛德·梯日奥特:

“我已经很长时间没给您写信了，我的老朋友。我已成了泥瓦工、木匠和园丁；我的整座房子还是狼藉一片，尽管我作了很多努力，但好像不可能像我希望的那样把所有的好朋友都安顿进来。我们俩人，德尼小姐和我，正忙碌着为我们的朋友和鸡群搭屋建房。我们还请人造了马车和推车；我们种植橘树和洋葱，郁金香和胡萝卜。不过一切还没准备就绪……我的房子在日内瓦地盘上，而我的草地则位于法国。在湖泊的另一端我还有一栋房子，整栋房子坐落在瑞士的土地上，是按瑞士的风格建筑的。我正在按照我的口味来装修。它将成为我的冬宫；而我现在住的这个小屋将作为我的夏殿。”

年届六旬的伏尔泰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环境，在这里找到了读书及写作的时间和力量。1755年8月30日，他给让-雅克·卢梭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他取笑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一书。卢梭在其文章中(1750)回答了迪戎大学公开征集答案的问题，否定了科学和艺术对改善社会风气的作用。这篇文化悲观主义的文

章使卢梭一举成名；突然所有的人，包括现在的人，都知道了一个流行的词叫做“回归自然”，而实际上卢梭自己从来没有用过这个词。只是在谈到科学和艺术时，他提醒人们不要过分地相信科技的进步。伏尔泰也误解了他的意思，他把卢梭的论点简单化并且夸大了。他写信给卢梭，并辛辣地讽刺了他：

“先生，我读了您那本反对人类的新著，感谢您写了这本书。您对一些人说出了您的真理，您会取悦这些人，但您无法改进他们。没有人比您更极端地披露了人类社会的丑恶，而我们还因为自己的愚蠢和幼稚相信会从这个社会里汲取许多慰藉。也没有人动用了像您那么旺盛的精力，不遗余力地让我们重返为野兽；在阅读您的著作的过程中人们不禁会兴致勃发，试着四肢着地去爬行。可是我拒绝这个习惯已有六十余年了，现在我只能把这个如此自然的习惯留给那些比您我更配用这个习惯的人们……”

伏尔泰以讽刺性的邀请结束了这封信：“从沙普尤斯先生那里得知，您的身体不是很好。到

我这里来吧，在您家乡的空气里恢复您的体力，您可以和我共饮刚挤出来的牛奶，并享用我们开满了自由之花和长满了美味的草地。”接着他署了名：“您友好忠实的伏尔泰以哲学同事的友谊致上。”由于这封信，卢梭把伏尔泰看成了死敌。

在接下去的几年里，六旬的伏尔泰购买了庄园图尔奈和费尔奈，添置了许多地产。总而言之他拥有了一笔可观的财产。这样他觉得自由些、独立些，在遭受迫害的时候也会相对安全些，因为他的房子一部分在瑞士的领土上，一部分在法国的领土上。一个哲学家说：“为了防范追踪他的狗，必须多拥有几个避难的洞穴。”伏尔泰竟有四个“洞穴”。

他尤其喜欢住费尔奈城堡，不过他住在这个漂亮的城堡里并不是为了休养生息。相反地，他显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活跃，不过要说明一下，早些时候伏尔泰就以他的活跃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写了很多书，年纪越大写得越多，因为他需要的睡眠时间越来越少。他满

怀热情地为受压迫的人们和受到不公正判决的人们排忧解难。他尝试着把他的农庄建设成一个模范之国；他开设生产手表的工场，然后把手表贩卖到俄国和土耳其；他设立农场，开展养蚕业，生产蚕丝，然后把蚕丝加工成长统袜。

作为无微不至的君主，作为费尔奈的族长，哲学家伏尔泰试图以他掌管的模范之国向世人和经常被他批判的统治者证明，人们可以改变对仆从的态度，也就是更人道地、更公益地、更公正地对待他们，不去剥削他们的劳动果实。为了吸引手工业工人到工场做工，他慷慨地给他们提供十分优惠的贷款。

如前面所说，六旬的伏尔泰是和他的侄女玛丽-路易丝·德尼一起生活的，她帮他料理家务，但她绝不可能跟绝顶聪明的侯爵夫人埃米莉·夏德莱作比。从四十到五十五岁左右，伏尔泰是和埃米莉·夏德莱一起度过的。她自己写书并翻译希腊文的书。而伏尔泰的侄女完全是另一类型，他对她也完全是另一种态度。一个到费尔奈城堡来拜访的女人这样描绘了她：

“伏尔泰的侄女简直要笑死人；身材又矮又粗，圆得像个球，是个怪人，很丑但心肠很好。她会撒谎，但不是故意也没恶意，她看起来有智慧，但实际上什么都不懂。她大呼小叫，她运筹帷幄，她谈论政治，她胡说不休。”如果他觉得她做得太过分的话，伏尔泰——她的舅舅会不顾在场的访客，对她厉声喝叱，并虐称她为“蠢婆娘”或“胖母猪”。死后伏尔泰把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她。价值好几百万。



乔治·克里斯托

夫·利希滕贝格

George Christoph

Lichtenberg

1742—1799

“如果人老了，必须再
给自己买几只小猫和小羊，
好让它们重新唤起最灵敏
的肌肉纤维里仅存的一点
谐和之音。”

小猫和小羊

——利希滕贝格

乔治·克里斯托夫·利希滕贝

格：德国物理学家、哲学家及讽刺

作家，以其嘲笑形而上学和浪漫主

义的过火论点而知名。他建造了一

座巨大的起电盘，发现了现代静电

复印技术的基本原理；主要作品有

《论古希腊的蠢驴的发音》、《英伦

书简》等。

人们常说，人对自己的年龄感觉多大，实际他就多大。这其实等于什么都没说。腓特烈二世五十多岁的时候就开始写年老，写附在身上的痛苦，伏尔泰则到了他生命中的第八个十年才写这些东西，六十多岁的时候还没着手做这件事。相反的，1742年7月1日出生于上拉姆施塔特（在达姆施塔特附近）的自然科学家兼哲学家格乔治·克里斯托夫·利希滕贝格五十岁没到

就觉得自己老了。利希滕贝格在哥廷根当过教授,并因其格言警句而永垂不朽。他年近五十的时候在他的一册《草稿集》中写道:

“确切地描绘逼近的垂老和对之的恐惧,牙齿逐渐地脱落,几根稀疏的白发。悄悄地了解所有这方面的情况。一个人如果十分仔细地注意了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他就会具有虚构人物并描述其性格细节的能力。人们就是这样学会描写人的心理的。走向衰老的人喜欢说,年纪比我轻的人也已经没有牙齿了,而且头发也白了,用这样的话来安慰自己,他总是把自己比作情况最理想、最有利的那类人。”

不久他又写道:“我的记忆力开始衰退,最初我是在这一现象中发现了我在衰老,有时候我会用缺乏记忆力锻炼作为记忆力衰退的借口,有时候我会把它归咎于我的年纪。这种或充满恐惧或充满希望的起伏心理陪伴了我一辈子。”

此前没两年,四十八岁的利希滕贝格才跟他的女管家结婚,而这时他们已经生了好几个

孩子。结婚的原因是他生病了；他觉得自己要死了，因此他希望通过结婚保证孩子和他们母亲的经济来源。他没有死，不过从此再也没有康复过。从那时起，他就一直卧病在床，穿着睡衣，戴着睡帽隐居到他花园里的小房子里，从那儿给朋友写信，给妻子用小纸条汇报自己的状况：“如果我把我的现在的状况描述清楚，那么我想我的朋友会原谅我至今所干的一切……”

从他的床上透过窗户往外看，利希滕贝格可以看到一块墓地，他自己有一天将要在哪里入葬。这个面对着墓地的老人却也写过这样的话：“如果人老了，必须再给自己买几只小猫和小羊，好让它们重新唤起最灵敏的肌肉纤维里仅存的一点谐和之音。”他生病和卧床不起的事实并没有妨碍他继续为下一代操心，直至五十六岁去世；此外这也没妨碍他跟一个年轻的女佣发展关系，临死前不久他还跟她——像他说的那样——干了“许多受撒旦教唆的事”。



乔治·萧伯纳

George Bernard Shaw

1856—1950

“即便是我的死敌，我
都不会祝愿他活到九十岁
的。”

峰回路转

——萧伯纳

乔治·萧伯纳：爱尔兰著名喜剧作家、文学评论家和社会主义宣传家，被誉为“17世纪以来英国最重要的剧作家”。著有《华伦夫人的职业》、《巴巴拉上校》、《伤心之家》等。192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我老了，已经完了。”这是六十岁的戏剧家乔治·萧伯纳在一封信里写的话。三十四岁的时候，他才开始写剧本，而且越写越成功。等到经济状况比较好的时候，他——那时四十二岁——跟一个富有的女人结了婚，像他说的，是一个“百万富婆”。六十岁的时候，1856年7月26日出生于都柏林的萧伯纳觉得自己到了尽头。他认为自己已经无能为力，再也写不出什么了，因为他做什么事都不成功。

然而十年之后，萧伯纳刚好七十岁的时候，



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也就不再去想他的末日，八十多岁还没有去想。虽然在九十岁生日之际他说过：“即便是我的死敌，我都不会祝愿他活到九十岁的。”但这位高龄的讽刺家只想借此说明他不乐于看到他的死敌也这么长寿。

“人应该读书学习到100岁，100到200岁之间从事他的事业，在200岁后才能开始养老终年。”根据这个座右铭萧伯纳还想活得再长一点。无论如何，当他因事故意外死去的时候，身体各部器官还是很健康的。九十三岁那年他在自家的果园里给果树修剪树枝，不小心从梯子上摔了下来，摔断了一条腿。强忍着疼痛他拖着腿走回家里，可家里没人。等到人们发现他，已有一些时候了；在一个较大的专科医院里住了几个星期，然后出院回家，但是从此之后他没有真正康复过。1950年11月2日他去世了。他的骨灰跟七年前去世的妻子的骨灰混在一起，撒在他们的果园里。



托马斯·曼

Thomas Mann

1875—1955

“……大量的礼物和鲜花。数不胜数的邮件。来自德国的贺电和信件。几乎读不过来，更不消说回信。……”

流亡中依旧硕果累累

——托马斯·曼

托马斯·曼：德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二战期间流亡国外。著有《布登勃洛克一家》、《威尼斯之死》和《魔山》等。192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与许多同样被迫离开德国的其他作家相比，托马斯·曼并没有因为二战流亡国外而被抛离生活的轨道。1935年6月6日的晚上，托马斯·曼在他的日记里写道：

“六十岁生日。快乐喜庆的日子。阳光灿烂。早上孩子们和莱丝格、纪泽一起，小蛋糕上插着蜡烛，读着诗句。大量的礼物和鲜花。数不胜数的邮件。来自德国的贺电和信件。几乎读不过来，更不消说回信。和莱丝格步行去苏黎世，然后和卡蒂亚坐车进城；书商在装饰橱窗。接了贝尔曼，他在车上递给了我菲舍尔夫人的礼物，在

家里递给了我他自己的礼物，一盒录满作家祝福的磁带。家宴。孩子们奏乐。拉舍尔夫妇来访，一起喝茶。不停地拆贺电和信件。节日的喜气洋溢在心头。也就是说这样艰难的生活也还是值得的，比我谦卑的担忧所愿意相信的美好一些。家庭晚餐上有贝尔曼、莱丝格和纪泽，还有香槟。大约二十位客人，挤满了厅堂的上上下下。取暖器边堆满鲜花，餐厅里摆满佳肴……一直闹到很晚。”

1875年6月6日出生于吕贝克的托马斯·曼，在《布登勃洛克一家》获得巨大成功之后，即使到了国外也不再默默无闻了。1929年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纳粹统治者对他离开德国这件事非常不满。开头他们还曾经希望他能回来，但后来，在托马斯·曼年届六十的时候，他们干脆剥夺了他的德国国籍。1919年授予托马斯·曼名誉博士学位的波恩大学哲学系，于1936年12月给托马斯·曼寄来一封公文，上面虽有系主任的签名，但却无法辨认。公文的内容如下：

“在征得波恩大学校长的同意后我必须通

知您,在您被取消国籍后,哲学系不得不把您的名字从名誉博士的名单上划去。根据关于授予博士学位条例第八条规定,您不再有权使用这一学衔。”收信人的称呼是:“作家托马斯·曼先生。”

公文上写的日期是1936年12月19日。但托马斯·曼在12月25日的日记里才提起这件事。日记里说:“我差点把它给忘了:波恩大学哲学系取消名誉博士资格的通知书,被剥夺国籍的连锁反应。——回信已作斟酌。”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就给“波恩大学哲学系的教授”写了回信,寄信的日期是1937年新年。在他的作品集里这封回信占了七页半。这封回信作为公开的信件已被翻成多国文字,并在世界各地出版,它是研究托马斯·曼生平的重要文献。因此无论如何要在这里摘录这封回信的开头:“尊敬的系主任,我已收到您于12月19日寄给我的阴沉的通知书。请允许我作出以下的答复:对目前的一切不幸,德国的大学同样负有沉重的罪责,这是他们自己附加给自己的罪

责,因为他们严重误解了历史性的时刻,使自己成为邪恶的权力滋生的土壤,而这种权利正从道德上、文化上和经济上摧残德国——德国大学的这种罪责早已让我因荣誉而得到的快乐转变成痛苦,阻止我在任何情况下使用这个学衔。

“有一个哲学名誉博士的头衔我至今还在使用,因为哈佛大学重新授予了我这个身份,而且解释了他们这么做的理由,我不想对您,系主任,隐瞒他们的解释。把拉丁文翻译成德文,文件的意思是:‘……我们——校长和大学评议会委员——在尊敬的大学督学的掌声中,在庄严的会议上宣布授予举世闻名的作家托马斯·曼为名誉哲学博士,同时授予他与该学位相关的一切权利和荣誉。作家在为我们众多的地球公民诠释生活的同时,与少数几位志同道合者一起捍卫着德国文化的尊严。’

“这是大洋彼岸——而且请允许我添一句,不只在那里——自由的人们在脑海里为我勾勒的形象,它与德国人目前对我的异样理解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我从来没想过用上面那段文字

来炫耀自己；但今天，在这里，请允许我引用它或者说我必须引用它；如果您，系主任（我不知道惯例是怎样的），已经差人在您们大学的黑板上张贴了您寄给我的通知书，那么我真诚希望，我的这份答复也能分享这份荣幸贴到黑板上；也许一些学术人士，学生或教授，在阅读此文的时候会怔愣思考一下，会感到一种转瞬即被抑制的、充满预知的惊骇，因为这篇文章犹如向恶意强制下的封锁和无知状态投进一缕来自一个自由的精神世界的匆匆的目光……”

年届六旬的托马斯·曼紧随此文之后又作了一篇详细的《声明》。在《声明》里他毫不含糊地站到了第三帝国统治者们的对立面，他指出：“纳粹国家体系的作用和目的只有一个而且只能是这一个：即无情地泯灭、镇压、根除任何反对‘即将爆发的战争’的动作和苗头，使德意志民族成为惟命是从的、毫无反叛精神的、于盲目和狂热的无知之中不能自拔的战争工具。”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

1879—1955

“战争赢了，可和平没有赢。人们允诺把世界从恐惧中拯救出来，而实际上，自从战争结束后，这种恐惧与日俱增；……”

谁先研制了原子弹

——爱因斯坦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美籍德国理论物理学家，创立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提出光子概念，获 1921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1879 年 3 月 14 日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出生在乌尔姆，比托马斯·曼小四岁。后来卡蒂亚·曼（在她的《无字的回忆录》里）对他作了如下回忆：

“我们可以说是邻居，所以经常看到他。他很令人产生好感，但并不特别热烈。实际上爱因斯坦骨子里有些孩子气，一双凸起的大眼睛；他有些天真，是个可爱的人。他绝对是个单向拔尖的天才，不是吗？他确实有一种特别的专业天赋，可他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引人注目。至于政治——他没有这方面的才能……”

不久以后，1939 年 8 月初，也就是二战爆

发前一个月,爱因斯坦,这个全世界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在他刚满六十岁之际,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了一封后果沉重的信,后来这封信被爱因斯坦称为“一个重大的错误”。信里强调——爱因斯坦说——“有必要大规模搞试验,以研究是否有可能制造原子弹。我应该是清楚这项试验成功后会对人类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的,但是我怕德国人也会成功地研制出原子弹,这样世界就不会再有太平了,这种可能性逼着我迈出了研制的第一步。我别无选择,尽管我一直是一个意志坚定的和平主义者。”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确实一直都是一个和平主义者。1913年,他作为相对论的创立者,被招入柏林的普鲁士科学院,又于同年被任命为威廉皇家学院物理研究所的所长。爱因斯坦于1921年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1933年出境旅行后再也没有回过德国,因为作为犹太人他在纳粹的集权下失去了安全感,他很早就相信,纳粹统治会带来一场灾难。爱因斯坦待在外国的時候,纳粹分子取消了他柏林荣誉市民资格,没

收了他的全部财产,他们甚至悬赏重金缉拿他。这时候爱因斯坦和他的妻子正居留比利时。

1939年,年届六十的爱因斯坦在给罗斯福写那封信时所并不知道的是:在德国并没有有人在研制原子弹。后来物理学家卡尔·弗里德里希·冯·魏茨泽克说:“我首先想强调一点,从来没有人问过我们这些德国的物理学家愿不愿意研制原子弹。”维尔纳·海森贝格也证明:“只可惜全世界的人都在说,德国也在研制原子弹。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事后许多人都在估算,爱因斯坦写给罗斯福的信影响到底有多大。爱因斯坦的传记作家罗纳尔德·维·克拉克认为:“没有爱因斯坦的参与,美国也有可能凭着自己的实力制造出原子弹。”然而他又补充说:“但没有他的帮助,美国不可能在对日作战时就可以使用原子弹了。”根据克拉克的叙述,给罗斯福的那一封信根本不是爱因斯坦自己写的,而是别人替他写好后,他签了一个名而已。克拉克说,总共不是一封信,而是三封信。不管怎样,原子弹还是造了,大家



地球，爱因斯坦……



都臆想着和德国搞军备竞赛，其实这只是美国的独角戏罢了。关于项目研制的具体情况，爱因斯坦不得而知。有人会认为，在洛斯阿拉莫斯测试原子弹的时候他亲自在场，而且作了指示，这是纯粹的捏造。直到美国人1945年8月6日和9日，分别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德意志帝国已于三个月前无条件投降），爱因斯坦才知道这一切的后果，包括他在给罗斯福的信上署名意味着什么。爱因斯坦是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的，死亡人数达26万人，受伤人数16.3万人。

但这并不是爱因斯坦所希望看到的或者说梦寐以求的事。广岛和长崎事件过后一段时间，爱因斯坦写道：“战争赢了，可和平没有赢。人们允诺把世界从恐惧中拯救出来，而实际上，自从战争结束后，这种恐惧与日俱增；人们允诺把世界从灾难中拯救出来，但世界上大部分人如今正面临饥饿死亡，另一群人则在物质过剩中生活……”



查理·卓别林

Charlie Chaplin

1889—1977

他声明说,即使是基督
耶稣成了那里的总统,他也
不会再次返回美国了。

再也不回美国

——卓别林

查理·卓别林：原籍英国的美国电影演员和导演。世界电影史上最伟大的喜剧演员。他因饰无声电影中一个哀婉动人、幽默风趣的流浪汉而蜚声国际。作品有《淘金记》、《城市之光》、《摩登时代》、《大独裁者》等。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有生之年满腔失望，他失望的是自由的西方世界并没有——像他一直所希望的那样——始终不渝地为实现真正的和平而努力。大概就在这个时候，另一位同样憎恨法西斯而拥护和平的六旬老人也对美国人失望了，他甚至觉得美国人侮辱了他的人格：他就是查理·卓别林。

卓别林原名查尔斯·斯潘塞，1889年4月16日出生在伦敦（比希特勒早四天出生，在后

来的电影《大独裁者》里他相当成功地扮演了希特勒的角色)，他的父亲是英国的一位男演员，母亲是一位女歌手，他的童年很不幸。父亲终日酗酒，然后拂袖而去，小卓别林只能和一个比他大四岁的异父兄弟住在母亲那里。尽管母亲从早到晚都坐在缝纫机旁干活，但是他们还是穷得叮咣响，几乎食不果腹。靠缝纫赚的钱太少，他母亲的体因疲劳过度也撑不下去了。在他六十八岁才开始着手写的回忆录里，他写道：“母亲开始偏头疼了，不得不放下缝纫这项工作，整天躺在黯淡的房间里。……我们的烦恼也越来越多了。分期付款还拖欠着。于是缝纫机也被抬走抵债了。——母亲别无选择：她要照料两个孩子，自己身体又很差，因此她决定我们三个都搬到贫民窟里住。”

那时卓别林六岁，对他来说，最要命的是他们母子三人不得不分开生活。贫民窟的生活给他留下了一辈子都无法抹去的可怕的阴影：住在那里就是一种耻辱，没什么吃的不算，还要经常挨打。而且到后来，母亲根本不来看他：他以

为,她像父亲一样把他给抛弃了。后来才听说母亲被送到了精神病院。

不过有一天,她出院了。她把两个儿子接到身边,又开始从早到晚地坐在缝纫机旁干活,直至她再次被送进精神病院。这时的卓别林已经十一岁了,他的父亲回家并想方设法让他进了一个木屐歌舞团。半年后卓别林第一次得到机会扮演一个小角色。之后他平步青云。二十一岁那年他跟着一个演出团来到了美国。

但是接下来他一直为自己教育方面的缺陷而烦恼;他从没上过学。在后来的回忆录里他承认说,他从来没有学习的欲望,他想接受教育,只是因为 he 不想觉得自己低人一等。演出的时候他很不自信,甚至非常怯场。“我希望自己,”他后来写道,“跟周围的人懂得一样多,……世人瞧不起那些没有知识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我想通过学习抗拒世人对我的不屑。所以从这时起,我空闲时就到旧书店去翻书。”

他买的第一本书是《英语语法》——由此可见他在学习上真的很无助——一本英语词典。

他想从这本书开始学起。但是到最后什么名堂也没学出来。书一直在箱子底下躺着。接着他又买了叔本华的《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据他自己回忆，这本书他前前后后读了四十年，读了一遍又一遍，即便，他补充说，没有一次是读透彻的。

大概在他买了叔本华的书之后不久，他突然觉得当演员不是件很惬意的事，而且也没什么大的出息。他已经存了些钱，但现在他要和一个朋友一起考虑，如何把这些钱投资出去，以便带来更大的财富。“我们两个都想致富”，后来他这么写道。“我们计划买两千公顷土地；剩下的钱用来养猪和种地。我们估算，每头母猪平均每年可以生产五头小猪，如果一切进展顺利的话，我们在五年内每人可以赚五十万美元……我们兴奋得几乎无法自制。吃饭的时候，睡觉的时候，醒来的时候，我们的眼前只有猪……”但是当他在一本关于养猪的小册子里看到“一系列猪的阉割图样”时，他放弃了养猪致富的念头，准备继续当他的演员。

一个女占卜师在其中也起了作用，坚定了

他继续作演员的信念。

“我可以预言，您会取得很大的成就。”她对他说，“您的眼前铺着一条极不寻常的人生之路。”看了他的手相之后她说：“您会拥有大笔的财富。因为您有一双生财的手。”占卜师果然言中。他才不过二十五六岁，预言就兑现了：“金钱和成就加速扑面而来。这一切令人不知所措，令人惊骇，但又十分美妙！”还没到三十，他已经可以预测，作百万富翁的日子已经指日可待了。

当金钱如此突然地朝他涌来之后，他有一次决定到纽约最著名的一家宾馆里订一个价格不菲的房间。“大厅富丽堂皇，在那里走动的人们自信非凡，这一切让我在订房间的时候颤抖。”快七十岁的卓别林回忆说。“我有些害羞地问，是不是得预先付钱。迎宾的主管人员非常客气地说：‘噢不，先生，这没必要。’穿过金碧辉煌和铺满丝绒地毯的大厅，我百感交集，走到房间的门口，我简直想哭。我在里面待了一个多小时，仔细地研究了装饰豪华的浴室，试了试喷涌而出的冷热水。享受豪华是多么的

棒，多么的令人欣慰呀！——我洗了澡，梳了头，穿上了新的睡衣，我要把这房间的价格提供给我的奢侈一丝一毫地享受干净。如果再来点可读的东西就好了，譬如说一张报纸。可我没有勇气打电话给服务台，让他们送来。我坐到房间中间的一张椅子上，带着无限的忧伤打量着房里的一切……”

然后他来到餐厅。“还没到平时吃饭的时间，餐厅里只有两三个客人。宾馆的服务员把我领到一张靠窗的桌子前。‘先生，这里可以吗？’——‘这并不重要。’我漫不经心地说，而且用了最好的英文发音。突然一群服务员鱼贯而出，给我送来了冰水、菜单、黄油和面包。我太激动了，以致于感觉不到任何饥饿。不过我还是装出一副胃口很好的样子，点了浓肉汤、炸鸡，还有香草冰激凌作甜点。服务员给我送来了酒水单，仔细研究后我点了半瓶香槟。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很累，所以我既不觉得饭菜好吃，也不觉得香槟好喝……”

整个情景清楚地表明，他还没有逃脱灰色

童年留下的阴影。其实他一辈子都在试着克服童年里遭受的创伤以及童年的不幸造就的胆怯心理。可是他从没成功过，而这也正是他能够取得无与伦比的成就的原因所在；只有这样他才能把羞怯的“英雄”真实可信地表现出来。

他很容易受伤，这也是他羞怯的一个方面。年届六旬时，人们怀疑他是共产党人或者过于亲共，为此他曾经深受伤害。因为他不是共产党员，也从来没有当过共产党员。这种怀疑来自他的一次讲话。那是他应美国政府的请求，代替正在生病的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在圣弗兰西斯科发表的一次演讲。这个演讲的内容是关于美国向正在跟希特勒抗战的俄国人可能提供的援助问题，而他对俄国人使用了“同志”这个称呼。事后他多次被“美国非美利坚活动调查委员会”传唤受审。另外，此间还发生了一件事。美国政府要驱逐从德国流放出来的共产党员汉斯·艾斯勒，一时引起许多争议，卓别林也参加了进去。他请求毕加索与他的共产党朋友一起在美国驻巴黎的使馆门前示威，抗议美国政府把汉斯·艾斯勒

驱逐出境。由此他在美国给自己制造了很多敌人。

尽管查理·卓别林已在美利坚合众国生活了四十年,但他并没有成为美国公民。1952年夏天他准备到英国休假旅行,为此他递交了一份“再次入境许可”的申请,以便旅行回来时不会被当成简单入境者,及早地避开一些可能的麻烦事。拿到许可证两天后他和妻子奥拉及孩子就启程到了纽约,他们想从那里坐船到英国。就在这时他的律师打电话通知他,一位从前的员工状告卓别林的“联合艺术”公司,索赔好几百万美元。律师建议卓别林隐藏起来,悄悄上船,以免去即刻被法庭传唤的危险。尽管如此,查理·卓别林还是出席了他刚刚出品的影片《城市之光》的新闻观摩会,这是他在美国制作的最后一部电影,它首次公映时卓别林已经远离美国。1952年9月18日,六十三岁的卓别林带着妻子和儿女坐上了去休假旅行的轮船。

在他的回忆录《我的故事》里他说:“清晨五点我登上了‘女皇伊丽莎白号’,如果不用躲避

有可能把我带去法庭的执法人员，这应该是个浪漫时刻的开始。我的律师告诉我，我得偷偷地上轮船，然后躲在自己的船舱里，直到领航员离开轮船我才可以在甲板上露面。在过去的十年里我学乖了，对最糟糕的情况也做好了心理准备，所以我听从了律师的指示……领航员终于离开了轮船，我打开船舱的门，来到甲板上，我终于自由了……大西洋辽阔的海平面清洗了我心中的不悦，我感觉自己脱胎换骨了。我不再是影视界的神话人物，也不再是被人憎恨的对象，我只是一个结了婚的男人，带着妻子和孩子一同去旅行。孩子在甲板上玩耍，而奥拉和我则坐在旁边的躺椅上。在这样的一种气氛里我明白了什么叫作完全的幸福——这是一种极近悲伤的东西……”

但是原先的度假打算，在后来却成了永久的告别。第二天发生的事就可以证明这一点：“没有比第二天吃饭时发生的事更可笑了。我们的客人有阿图尔·鲁宾施泰因夫妇以及阿道尔·格林。午餐进行到一半，有人给哈里·格罗克

尔送来了一份电报。他想把电报塞到口袋里,但是送信的人说:‘话务员等着您的回音。’读电报的时候,哈里的脸色阴了下来;然后他说了声抱歉,离开了桌席。后来他让我到他的客舱里去,把电报读给我听。电报里说我拒绝重返美国,实际上我是打算回去的。另外电报里说,我必须回去听候移民局的审讯,这样我可以对被控一事做出表态,据他们理解,这是一场关系到政治和道德的官司。《联合报》想知道,我愿不愿意为此事发表一篇评论。——我的每根神经都绷紧了,几欲崩裂。我还会不会重新踏上这样一个不幸的国度,这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我很想说,我想尽快摆脱这充满仇恨的氛围,美国人施加给我的侮辱以及他们在道德上的傲慢几乎让我窒息,我已经腻烦了。但我的全部财产还在美国,我担忧,人们会不择手段查抄我的财产。现在我不得不预计美国人的种种肆无忌惮的行为。所以我递交了一份爆炸性的声明,声明我会回到美国,并对被控一事做出解释。声明我的再次入境许可证不是一纸空文,而是美国政府因



为信任我才当面交给我的证明材料——等等，等等……”

可后来查理·卓别林还是没有回到美国，没有回到一个和他一起制作过八十五部电影的国家，作为演员、导演、制作商或者同时兼任这三种工作。审讯让他觉得自己被大大地羞辱了一番，仅仅对他这样一个反法西斯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的怀疑，怀疑他背着美国搞阴谋活动，就给他造成了不小的伤害。他的妻子是美国公民，所以她会毫无阻碍地再次入境，等她返回美国把所有的财产都安置妥当后，卓别林再也无法抑制对美国的怨恨了。他声明说，即使是耶稣成了那里的总统，他也不会再次返回美国了。

这个声明招来了更多的敌人，也并非没有留下后果；在美国，他的影片《城市之光》和《凡尔杜先生》被禁放。但是在欧洲，它们却大获成功，虽然卓别林在这两部影片里没有以一般人所熟悉的和大家所期待的方式出现，而是要表述观点。这个上了花甲的老人在经历了这一切

气恼之后，依顺妻子的愿望最后定居在瑞士，在那里他还生活了将近四分之一世纪。六十多岁的时候他说：“等我们年纪再大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满足于总是沿着一条老的线路往前走了……”



马克·吐温

Mark Twain

1835—1910

“方案已经定下来了。
我不能再闲下去了。我必须
重新回到工作上去，写书，
作报告。……”

第 99 或第 100 个人

——马克·吐温

马克·吐温：美国最孚众望的幽默小说家和演说家。以善写历险故事及抨击人类的弱点与虚假而闻名于世。代表作有《汤姆·索耶历险记》、《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艰苦岁月》、《镀金时代》等。

与爱因斯坦和卓别林相比，年届六旬时的马克·吐温，《汤姆·索耶历险记》(1876)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1885)的作者，有着完全不同的烦恼和忧虑。这位美国记者、作家兼发明家曾经是密西西比河上的领航员，后来靠写作赚了不少钱，上了六十却突然有很多亏损，以致债台高筑。那是在 1895 年，马克·吐温光是亏损就高达 20 万美元。这些亏损来自于他投资研制的某种排字机彻底失败，而与此同时更先进的排字机却已经成功问世，于是他的巨额投资完全

打了水漂。

大概也就在这一段时间里，马克·吐温的出版社宣告破产了，他所有著作的出版权都交给了这家出版社，并和他的妻子一道在这家出版社投资了很多钱。债主要求 10 万美元的赔偿。“虽然在法律上我可以不管这笔债务，但是在道义上我问心有愧。”马克·吐温在后来的自传中这么写到。他不愿意只用他们投资额中的一小部分来应付债权人。他妻子的一席话更坚定了他的想法。她说：“房子是属于我的，债权人应该拿去。你的书是你的财产，全交给他们。有多少可能就还多少债务，然后投入工作，挣钱还清剩下的债款，只要债主对此表示同意。别害怕！我们会一分不少地将债务还清的。”

但是后来事情还是没有按她想象的那样去办。一位叫罗杰斯的经济学家阻止他这么做；他急切地劝告马克·吐温不要把他妻子名下的房子转给债权人。而对以后的事影响更大的是：“他同样劝阻我把作品的版权让给债权人。”因为版权还可以给作家带来高额的版税！但从根

本上说,罗杰斯还是完全同意马克·吐温及其妻子的意见的。他说:“生意有它自己的游戏规则和实际操作,这也是合理的。但对一个作家来说,良好的名誉和生命一样重要。他可以没有钱,但不可以没有性格。您必须一分分地把钱赚回来,然后一分分地把它还回去。”马克·吐温在他的自传中补充说道:“方案已经定下来了。我不能再闲下去了。我必须重新回到工作上去,写书,作报告。我的妻子估计,四年后我就可以还清债务了。”

但是时隔不久,马克·吐温又完全失去了平静。他有一次偶然听到了两个生意人和罗杰斯的谈话,他们在讨论破产者的命运,最后得出结论,若不是98%,也至少有95%像马克·吐温这把年纪的人再也无法爬出破产的泥潭了。“这个结论一直萦绕在我脑子里;一种不祥的预感充斥在我心头,挥之不去……我到底还有几分机会能例外地成为那第99或第100个人呢?不过我没有灰心很长时间;不久我夫人就知道了我的苦闷,她立即抓起手头的笔和纸,非常清晰并

且有根有据地算出接下来的四年中我们能赚多少钱,结果是令人欣慰的……”

他妻子的计划是作一次学术报告旅行。马克·吐温同意了。“我发现她的想法是对的。她总是对的……当然我们要花很多时间去准备这次环球的学术报告旅行,要预约好所有的时间,不过我们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他们出发时,日程已经排满了十二个月。

1895年他们启程了。年届六旬的马克·吐温自己将这次报告旅行称为“我们的掠夺性环球远征。我们出场十二个月,抢夺,劫掠。我写了一本书(《赤道旅行记》1897),并拿去出版了。出书和做报告的酬劳一到手,我就悉数寄给罗杰斯先生。他把钱存入银行,准备还债。我们让他先把小笔的债款还清,因为这些债主急需这笔钱,但是他没这么做。他说,等我真正敲够了整个世界的竹杠赚够了钱,我们会把所有的钱按百分比还给公司的各个债权人的。——1898年年底或者是1899年年初,我正在维也纳,罗杰斯打电话给我说:‘我们已经把所有的债务还

清了,一分不少。还剩下 18500 美元,我该怎么处理这笔钱?’——我回答说:‘购买联邦钢铁公司的股票!’——他照我的话去做了,只留下了一千美元,两个月后他把钱重新取出来,我们赚了 125% 的利润。”

这时的马克·吐温已经将近六十四岁,他终于成功了。而这以后他也未能歇脚。原本计划十二个月的报告旅行结果持续了整整三年。快到六十五岁的时候他才回到美国。在那里他继续生活了十个年头,并大量著述,其中有他去世以后很久才出版的自传。



理查德·瓦格纳

Richard Wagner

1813—1883

“以前我总是缺钱，我的收入总是不稳定，实际上我一直是像乞丐一样生活。”

疯狂弗里德

——瓦格纳

理查德·瓦格纳：德国作曲家，
毕生致力于歌剧的改革与创新。作
品有歌剧《漂泊的荷兰人》、《纽伦
堡名歌手》及《尼伯龙根的指环》
等。

理查德·瓦格纳 1813 年 5 月 22 日出生在莱比锡。他的六十岁生日原本是想在后来被他称作“疯狂弗里德”的新房里庆祝。不管怎么说奠基的时候他是打算 1873 年 5 月 22 日之前迁入新居的，带上他的妻子科西玛和四个小孩。但是后来所有的活儿都延迟了好几个月，他和科西玛因此非常生气，这是他们所始料未及的。

科西玛精心准备了瓦格纳的六十岁生日，她费尽心思，希望这一天瓦格纳都是在“一个又一个的惊喜”中度过，从早到晚，包括晚上的宴会。她在日记里记下了整个过程，例如她和孩

子在午餐的时候是如何举杯向寿星祝寿的。

“我问：谁应该长命百岁，丹尼尔？‘最忠诚的守护者’。起立，拿起酒杯。谁应该长命百岁，布兰迪尼？‘最可亲的朋友’。谁应该长命百岁，伊索德？‘最善良的父亲’。谁应该长命百岁，菲迪？‘我的爸爸’，话音刚落，乐声四起，奏响了瓦格纳《罗恩格林》第三幕的序曲。我们大家都感动得热泪盈眶。”

对瓦格纳来说六十岁那天是幸福的一天。可是六十岁的第一个夜晚他却做了一个很不好的梦，科西玛在日记里说：“理查德的梦很悲凉，他梦到我把他赶走了，因为他为了玩，卖了我所有的首饰。我不愿跟这么不上进的人一起过日子！”

困扰他直至梦境的是他窘迫的经济状况，瓦格纳一辈子都在与之作斗争，虽然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竭力帮助他，他还是摆脱不了窘境。因为他对生活的要求总是超过他的实际承受能力，虽然他自己不是这么认为。在此之前不久，用于庆典会演的拜罗伊特剧院开始奠基，剧

院的建造“侵吞”了不少钱，以致于巴伐利亚政府后来都不大愿意提供补助了，不仅如此，瓦格纳造私人住房所花的钱也要比原先计划的费用高出好几倍。在设计建筑蓝图的时候他说，造这房子是“为以后惬意的生活奠基”。他还说明了理由：“以前我总是缺钱，我的收入总是不稳定，实际上我一直是像乞丐一样生活。”

在此期间，房子的框架已经搭好，家族墓室和花园也修得差不多了，他和科西玛开始考虑装修的问题。地毯挑好之后，科西玛越来越多地在日记里提到造房子带来的烦恼。瓦格纳生日过后没几天她写道：“理查德觉得不爽，造房子惹得他一肚子的火，建剧院也带给了他不少的烦恼……”

首先令理查德恼火的是，造房子的速度不够快。科西玛担忧的却是：理查德花在装修上的钱越来越多了，甚至老是梦想拥有一切想象得到的昂贵之物：“我觉得自己好像已经不是真正活着了，而只是在做梦，因为我自己是那么毫无所求，当我听到理查德想买汽车和马的时候，我

庆幸他还是那么朝气蓬勃,那么年轻……”她在1873年6月11日的日记里这么写,她虽然庆幸他还年轻,但这并没有消除她的忧虑;第二天她就写道:“其中也有许多忧虑;房子的费用越来越高,孩子的开销越来越大,可收入没有丝毫增加。”接下来的一天:“我担心房子的格调会误导孩子,以为自己富有,从而不再珍惜他们拥有的东西。”

理查德和科西玛经常公开讨论他们的房子以及跟造房子有关的问题,即便在孩子面前也毫不隐讳。所以连四岁的菲迪也知道造房子是一件很重要的事。1873年6月27日科西玛在日记里说:“早上我们问菲迪,他长大了想干什么,他说,‘做新房子的主人。’”在同一天的日记里她接下去写道:“雨天,但我们还是到新房子去了一趟,带着所有的孩子……”第二天就说:“一大早就到新房子里去,试了试暖气装置。”两天之后:“新房子里很多烦心的事,可能是因为搬家的事拖的太久了。”

每隔几天科西玛就做一些类似的记录,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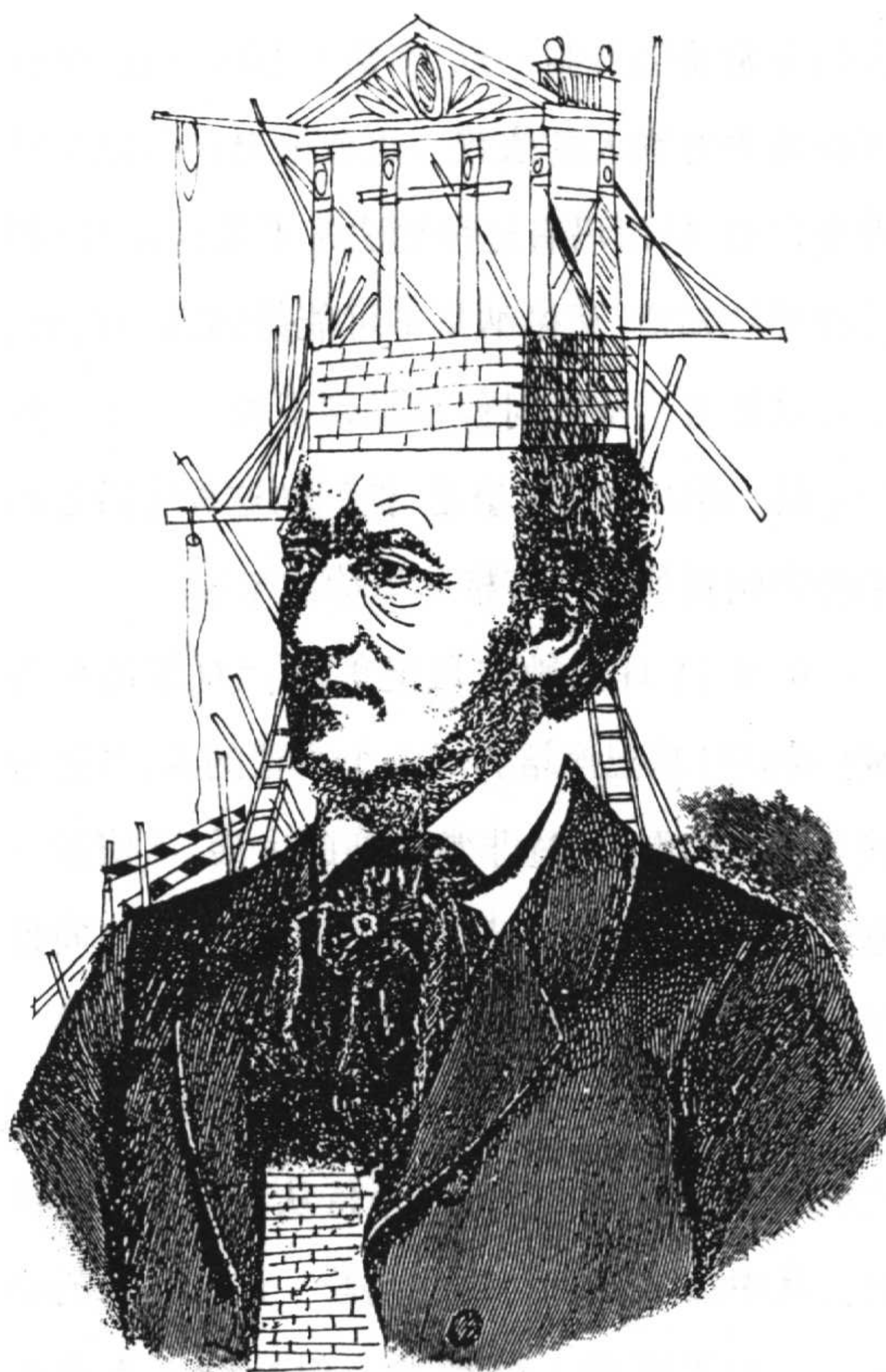
时写得更详细：“理查德在新房子里很恼火，韦尔夫尔先生（建筑师）粗鲁而阴险。”——“我也签名作抵押贷款了。”——“忙于装饰新房。”——“生活老是一个样，离不开这房子带来的烦恼。”——“……像往常一样来到新房子里。决定不做任何形式的修饰了，保持它简单的样子，一切根据实际情况办。”——“世界很宁静，只是这房子给我们造成困境。”1873年8月23日：“到新房子去，这是个经常有烦恼等着我们的地方。”

5月的时候他们就想搬到新房子里去了，可到了8月底，房子几乎仍旧是一个毛坯房。8月30日：“中午在新房子里，房子没有任何进展。”9月4日：“在新房子里，理查德找到许多生气的理由；大概还没有一座房子像这座房子一样没人监管地进行建造的。”四天后：“在新房子里理查德已经无法压制心中的怒气了，他大声喊到：我们宁愿住到墓室里也不要进这房子。”

这时，瓦格纳不仅气恼他的房子，同时也为

正在建造的庆典剧院生气,而且生的气更大。有时他也对他的工作以及其它许多东西发火。科西玛非常希望节制一点,生活上节俭一点,这样可以减少对别人的依赖,也就是自己可以生活得更自由,科西玛有这种想法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她早就知道,瓦格纳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不管是他五十岁的时候还是到了现在六十岁这个年龄。所以她的愿望是,他们的这种生活起码不能影响到他儿子齐格弗里德的未来。

9月11日,她在日记里说:“对菲迪的告诫!我们打算把他培养成一个幸福的人,只让他继承少数的财产,过非常简朴的生活,不依赖于他人,从而懂得去同情世界,而不是一味地向世界要求什么和索取什么,因为要求和索取是一个无底洞。我们把房子的最顶层留给他,他就应该满足了,他只能配有一个侍从,应该刻苦读书,从中汲取自由思想的光芒。记住父亲的痛苦——他需要别人的帮助,但是别人不理解他。”——科西玛从一开始就很清楚,正在建造的房子将要由齐格弗里德继承,这种想法让她



觉得理查德和她为造房子花费的心血没有白费。

9月中旬，科西玛的日记里说：“理查德非常生气……生房子的气，因为那儿的人声称要罢工……”她没说工匠为什么用停工来威胁他们。但在几个星期前她就谈及：“如果10月份凑不足1万古尔登，那么房子必须停工。”她曾经考虑：“我要不要把私房钱拿出来？”由此可见工匠要停工是因为钱不够了；他们担心拿不到工资。现在事情能否解决就取决于路德维希国王会不会为下面的资金提供担保了。

可国王自己也几乎没有资金可以支派。10月初，科西玛在日记里写着下面一句话：“房子没有进展，花费却如流水。”接下来一天，10月7日：“去了新房子，什么进展都没有，理查德非常生气。”她就这样日复一日地抱怨着。更糟的是，科西玛和理查德的观点出现了分歧：她想省钱，他却想花更多的钱。“理查德不断地想购置家当，我却不断地担忧经济拮据。”

于是在12月23日一场“家庭战争”爆发

了：“令人悲伤的早晨，我想说服理查德，不要用贷款的方式来加快造房子的速度。——他不愿采纳我的意见，而且觉得我很畏缩。我难过得哭了，我压根儿没有自私的愿望，只是担忧灾难的降临，并且已经看到来自四面八方的灾难了……”——但到了晚上，她又满怀信心了：“理查德说，七十岁他要写乐剧《帕西法尔》，我要提前到六十五岁。他说，条件是我不用我的怯懦来抑制他，而是让他马上就把房子造好，我们笑了；但是笑的时候，我一直把泪水往肚子里咽……”

可房子决不是马上能造好的；其原因并不在于科西玛的畏缩。5月的时候她确信最迟在圣诞节的时候可以搬到新家里去了，但是一直到12月13日还看不到任何可以搬家的迹象：“新房子像一个沉重的噩梦占据在我的脑子里。我害怕这房子误导我们过度支出，超出了我们的经济承受能力……”12月23日科西玛写道：“下午我们出去了，到了‘烦恼之家’，这是我们给这幢房子起的外号，因为在房子里我们不断

地发现漏洞或被遗忘的角落。”根据 12 月 31 日日记的记载,他们是这样结束 1873 年的:“忙于检验来自维也纳的装修样材;所有事与理查德一起料理。房子里一塌糊涂,工人们肆无忌惮,让人气不打一处来……”

新年来了,新的烦恼也随之而来。新挖的水井水质不行。更糟的是持续的经济问题。2 月 9 日科西玛写道:“工头告诉我们工人们很粗鲁,在这一带的饭馆里到处声称,如果我们不把工资付给他们,他们就要把我们告到行政管理委员会去。现在事关重大的就是如何筹到 5000 古尔登,国王对我们还是撒手不管的话,我们,我和理查德,决定动用我的私房钱……”

不知是用科西玛的钱还是用国王的钱,反正工匠的工资还是付清了。不管怎样房子可以继续装修下去了。但是麻烦并没有因此而过去。3 月 25 日日记里写着:“一整天我们和孩子一直在新房子里;那里需要干很多的活,同样理查德老有一大堆麻烦,因为出现了重大的结构问题!”

复活节来了,他们还是没法搬到新家里去,不过现在科西玛第一次说到了房子的好处。复活节前夕的星期六,理查德“在新居里洗了第一个澡,觉得很舒服,发现新居有不少优点,回家的时候他整个人都变了样!”星期天他又在新居里洗了澡,而且连续几天,只要一有可能,他就这么做。

1874年4月28日,“‘乔迁’的日子终于来了。”科西玛这么写道,却在后面又添了一句:“房子还没修好,还差很多,只是我们自己想搬家了而已。”晚上:“舒适地共进晚餐;三个孩子以埃娃为首,感谢我们把房子布置得这么漂亮。菲迪也有自己的房间。”盼望已久的这一天即将结束时,理查德和科西玛蒙着月色来到阳台上,俯视着花园和墓室,理查德称这房子为“最后的幸福”。大概一个星期后他又把房子更名为“疯狂弗里德之家”。他跟科西玛说,黑森有个地方叫做疯狂弗里德,这两个词的组合有种神秘感。1874年5月4日晚:“小孩第一次在新居洗澡;笑声不断。不过还有许多安置和分布上的烦

恼。”

搬家的前三个星期,理查德·瓦格纳对科西玛说:“我还想享受二十年的幸福生活。”可惜他没能在他的新居里实现他的愿望,不过他还是活了将近十年。对他来说最舒服不过的就是浴室了。1874年5月22日,他六十一岁生日,这是他在疯狂弗里德过的第一个生日,科西玛这样描述了这一天:“小孩在理查德的浴盆上点了61支蜡烛,周围布满了花环和花束,完全是他们自己的创意;大家都开怀大笑……”

一年之后,科西玛在瓦格纳的第六十二个生日时也写了点东西,这听起来就更有意思了,其间的一年里他们已经适应了新居的生活:“一大早孩子就祝福父亲,送上威尼斯的玻璃杯(把杯子摔破,以保岁岁平安);11点第二轮祝福:希望父亲有信仰、有爱情、有希望(菲迪、洛尔迪、埃娃各祝福其中的一个方面),62个气球飘在空中,客厅里点着蜡烛,有生日歌的伴奏。理查德对我说,我已给了他我的全部,我就像一位母亲一样为他操劳——孩子们非常严肃但

又喜气洋洋地朗诵了他们的诗歌；埃娃尤其激动。——晚上疯狂弗里德灯火通明，烟花，施特劳斯的华尔兹舞曲，孩子们举着火炬的队伍；一切都散发着幸福的气息，天气也很好，理查德很开心，也很感动。我的内心深处有些悲伤，这是过节的时候常有的事——一切都是上帝赐给他的。”（许多贺电，包括国王寄来的。）

但是理查德·瓦格纳在其生命的第七个十年里真正的高潮并不在于他的私人生活。这里要提到的是，疯狂弗里德并非单纯的私人住宅，而是类似于一种职业官邸，一个神圣的瓦格纳家族的神府，在这里大师可以像国王一样自由地、不受制约地——作他的精神领域的国王。即便如此，真正的高潮还是1876年8月拜罗伊特的庆典剧院的落成典礼，即在那里首次上演瓦格纳的《尼伯龙根之歌》。当时六十三岁的瓦格纳会见了巴伐利亚的国王，普鲁士国王兼德意志皇帝，巴西国王，符腾堡国王和一大堆侯爵、绅士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当瓦格纳在拜罗伊特火车站迎接皇帝威廉一世时，威廉一

世对他说：“没想到你真能把这件事办成。”

瓦格纳成功了，他战胜了有时看来不可战胜的反对力量，战胜了众多的嫉妒者和他们的阴谋：他早就梦想有一个自己的剧院，只上演他的作品，现在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

1876年8月13日是个星期天，星期天之后剧院推出了一系列丰富多采的节目：《莱茵黄金》，《女武神》，《齐格弗里德牧歌》，《众神的黄昏》，中间安排宴会、演说。演出肯定很精彩，也很扣人心弦，当然也会出现失误。那几天科西玛显然没有多少时间去写日记，不过她还是简略地记载了一些小插曲。例如：

“8月13日，星期天，第一场《莱茵黄金》整个地不顺，贝茨丢了戒指，说咒语的时候两次跑到舞台布景后，布景交换时一位工作人员过早地把天幕拉开了，人们可以看到穿着衬衣站在里面的演员和剧院的后墙，所有的歌唱家都极不自然，等等……理查德一开始很扫兴。

星期一，14日，上演《女武神》，这次没出差错；只是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把理查德吓了

一跳。他被皇帝叫去，皇帝大大称赞了一番，开玩笑说，如果他是音乐家的话，理查德是不会把他弄进乐团的；他对只能看两场演出就要离开表示遗憾……然后他告辞，向后退了一步，没有注意到门槛，狠狠地绊了一下，理查德费劲全力才把他抱住。他确信，如果这一跤是朝后仰的话，皇帝先生的大命就难保了！

星期二，15日，贝茨先生拒演齐格弗里德！他说他的嗓子哑了，大家非常扫兴。……理查德很奇怪地保持了冷静。

星期三，16日，《齐格弗里德牧歌》演得很好，可以说，贝茨先生一点都没有哑！……

星期四，17日，《众神的黄昏》也演得很成功；什未林大公爵带着夫人和女儿来观看。魏玛的大公爵也来为我们捧场，看了早晚两场……

星期五，18日，拜访，聚餐，不停地来来回回，前所未有的繁忙，傍晚宴请；理查德即兴发言，一点儿没准备，但说得很棒，他阐释《浮士德》的最后一首合唱曲，说，一切短暂的东西都只是个比喻！其思想是：永恒的女性的东西拉着

我们向上。这位帝国议员很不幸地说,人们无法预料未来人会怎样看待这件事,但我们应该肯定我们所作的努力!……

星期天,19日,安静,也就是说告别和迎接之日;第一轮观众现在离开了,第二轮的又来了。晚上有200多人聚在我们这儿。人们说,报纸上报道得很卑鄙,说的是德国报纸……”

也就是说事情不仅仅有高兴的一面。第二轮演出结束后作了结算,结算表明,这一成功带来了148000马克的经济损失。等到帐目全部结清时,六十多岁的瓦格纳已经到意大利旅游去了,他已经劳累了很长时间,现在想好好地放松一下。前面他还有六年半的生活和创作时间。他曾经答应科西玛要在七十岁的时候写完歌剧《帕西法尔》,结果他六十九岁的时候就写好了;可惜他根本没有过上自己的七十寿辰;在其生命的第七十个年头,1883年的2月13日,瓦格纳在威尼斯与世长辞。三天后他的遗体下葬在疯狂弗里德的花园墓室里。



特奥多尔·冯塔纳

Theodor Fontane

1819—1898

“……对生活观察得越久，我越清楚地看到命运的铁一般的逻辑，作为个别的人，他被赋予了这一样，另一样他就不会得到。……”

到底谁是刺

——冯塔纳

特奥多尔·冯塔纳：德国作家，
曾任德法战争中的战地记者。代表
作品有《埃菲·布利斯特》、《施特希
林》等。

冯塔纳 1819 年 12 月 30 日出生在诺伊鲁平，父亲是个药剂师，快到六十岁的时候，冯塔纳发表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即他五六年前就着手写的《风暴之前》。直到创作这部小说时，他才找到了他真正喜欢的职业。在此之前他作过药剂师，当过编辑和记者，靠他很一般的收入勉强维持全家人的生活。

对于妻子这边的亲戚来说，冯塔纳“是个有名的内弟，但我们当中没有人认得他”。这种情况不管怎么说还是持续了很长时间。有些时候，他的妻子觉得不可理解，为什么特奥多尔·冯塔纳在一些薪水高，又受人尊敬的职位也干不下

去；但他就是不喜欢头上有人对他指手画脚。“人不能违背内心最深处的天性。”冯塔纳说，这时，他已经下定了决心，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作一个自由的作家，尽管他此刻还不能说，他的选择是正确的。

从那时起一直到去世（1898年9月20日），他只做给自己带来乐趣的事，那就是写小说，长篇的和短篇的。他大概在二十年的时间里创作了他的全部叙事作品，其中最出名的是长篇小说《施特希林》和《埃菲·布利斯特》。其它作品，甚至戏剧评论，也都获得了公认，取得了成功。这样说，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很容易的，而在一百多年前，对冯塔纳自己来说，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在刚刚出版了《沙赫·冯·乌特诺》之后，六十三岁的冯塔纳表示：

“命运没有赐给我真正意义上的成功，今后也不可能再赐予我。我只能靠生命博彩赢得的50塔勒量人为出地生活。对生活观察得越久，我越清楚地看到命运的铁一般的逻辑，作为个别人，他被赋予了这一样，另一样他就不会得

到。这个人作投机总是很幸运，那个人总是倒霉；这个人始终爱情生活很幸福，那个人始终很不幸；这个人三次周游世界平安无事，那个人每次出门的时候不是轮胎爆了，就是一匹马脱缰跑了，至少也要遇上瓢泼大雨。根据这条不可变更之法则，我的书幸运与否，早已定了终身；我将一直只获得平平的成功，再也大不了了。《沙赫·冯·乌特诺》这本书的情况也将证明这一点；它很快就出了第二版，但要想再怎么样看来已经不可能了。书商和读者很快转向其他‘上帝’。一切都只能存活⁸天而已。”

冯塔纳毕竟是悲观了一点。更大的成功还是要到来的，只不过不是在他的有生之年，那时，他的书没有达到数百万册的印数，甚至没有达到几十万册。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他也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经济状况的改善，虽然他很需要钱。至少他还得照顾好几个孩子，尽管他已年届六旬。对此他毫无怨言，只是孩子们对他的态度令他很伤心。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冯塔纳 1883 年 1 月 3 日写给他多年朋友罗尔小姐的信中看出来：

“虽然没有东西折磨我们,压抑我们,但节日并没有提起我们的兴致。我的夫人把它归罪于我,说我节日的这几天,直到31日,只知道工作,每天7点就一头扎到剧院里(除夕剧场);不过这只是个误会,没有高兴起来的真正原因在于我们的全部身心已毫无快乐感觉,一切都被某种烦恼和不快的事压抑着;孩子们——只有弗里德尔例外,他很善良,善解人意,讨人喜欢——在内心的最底端都不满于‘这种可怜的生活’;他们三个老是在心里嘀咕:‘天哪,我们恰恰碰上了这么贫穷的父母,我们真是太倒霉了’;他们对自己拥有的无数的好东西视而不见,不能真诚、深入地认识我的努力,因为我的付出相对来说收效甚微,令他们感到不快。我的夫人在这方面则表现了非常多的理解力,令人爱戴(应该说整个家庭里,包括我在内,她是最好的),只是老有病痛折磨她。我虽然做很多工作(或许恰恰是因为这些工作),却是惟一一个常常真正有开朗心态的人,而且,只要孩子们内心深处的不悦还没有扼杀抵消掉我的这种开

朗,我也会将它表现出来。孩子们如此地不明事理和以怨报德让我非常生气。从来没有一个孩子站出来,说:‘应该这样;我来承担这个,这是我的事了。’——全都完全要按照自己的爱好生活。爱好这东西并不是坏事,他们并不做什么傻事,他们也不懒惰——但是每个人都由着情绪来,追随自己的天性,没有人懂得义务这个更高的东西。他们做这做那,也干一些好的、理智的事,但是只要心中稍有不快,这事就搁下了。可能我也曾经是这样的,可能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的;但是肯定也有另一些人存在,他们不是仅仅为了个人的爱好而活着,而是为了某种真正美好的,超越了自我的事业而生活,充满了力量和勇气。可惜我周围尽是这样一些事情,对这类情况的观察往往令我很痛心,这也会让一个人对包括自己在内的整个人类失去信心……”

年过花甲的冯塔纳也很敏感,非常的敏感。他太长时间得不到赞扬和承认,这使得他的愿望,获得承认和感谢的愿望不是淡化了,而是更强烈了。



克拉拉·舒曼

Clara Schumann

1819—1896

“只是一种忧伤的高兴
罢了。浓浓的爱意包围着
我，可我们又失去了多少爱
啊！……”

内心最深处的感动

——克拉拉·舒曼

克拉拉·舒曼：德国女钢琴家、作曲家，作曲家罗伯特·舒曼之妻。曾在法兰克福霍赫音乐学院任教，作品有钢琴协奏曲、歌曲及钢琴风格小品等，并编订出版了丈夫的作品集。

女钢琴家克拉拉·舒曼与特奥多尔·冯塔纳同年步入花甲，她的生日是1879年9月13日。克拉拉·舒曼，原姓维克，二十一岁的时候违抗父命与作曲家罗伯特·舒曼结了婚，六十岁时已经守寡二十三年。她孤身一人抚养了七个孩子，为此她举办了许多钢琴音乐会，不得不经常到异国他乡作巡回演出。还在罗伯特·舒曼活着的时候，她就与比她小十五岁的约翰·勃拉姆斯建立了友谊，直到克拉拉生命的尽头——她活了七十六岁——他俩之间一直都有友好的书信往

来。勃拉姆斯最初生活在他的故乡汉堡,后移居维也纳。在写给他的书信里,克拉拉·舒曼毫无保留地倾吐自己的烦恼和问题,当然也谈她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在罗伯特·舒曼去世后的最初几年,她经常会感到金钱方面的困扰,因为罗伯特曾经在一个精神病疗养院呆了好几年,花掉很多钱,所以那时她没有积蓄供自己和孩子生活而必须去赚最基本的生活费。而到了花甲之年,她的经济状况已经相当好了。现在她所担心的是自己的健康;她的手指,有时是整个手臂,会突然疼痛,这毛病她不到五十岁就有了,一直令她不安,而现在发作越来越频繁了。她害怕自己很快就不能上台演奏了。1879年10月,她在日记中写道:

“我的手臂经常疼痛,我真的很难过。我又把勃拉姆斯音乐会作品练习了一下,希望今年冬天能演奏它,可是不行;虽然这作品对我来说一点也不难,但是我的肌肉绷得如此之紧,我只能放弃,含着眼泪将乐曲拿开。我对这个音乐会实在是痴迷,她已经占据了我的心,只有那些最

好的音乐才会这样。”

她回忆几天前在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博物馆演奏 D 小调音乐会的情景：“听众热情极为高涨。我也弹得很漂亮，这我知道。尽管如此，整个晚上我心里都很难过。我不知道，为什么连续几次都是这样，每次一上台我就很悲伤。而且我还总是在想，马上就将是最后一次了……离开观众，我会很痛苦，因为我目前恰恰比任何时候都弹得好。我还是得大大地减少演奏，最起码得好好地控制自己，因为弹琴对我的健康影响很大。”

克拉拉·舒曼从来都是贝多芬、肖邦、舒曼和勃拉姆斯作品的最佳演奏者。事实上，罗伯特·舒曼的作品只是因为她的演奏才名声四起，而且也是她想方设法让舒曼的作品得以出版的。这又给她添了不少负担，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她 1879 年平安夜的日记里看出来，其中也透露了她对卧病很久的儿子路德维希的担忧。

“再也没有那么多人能像从前那样与我一起欢度节日了！不过今天我内心还是深怀感激

的,因为有两个宝贝孩子在我身边。我老是记挂着我们可怜的路德维希,可我已没法送给他哪怕是很小的一点礼物了,因为他已昏迷不醒。”三天后她继续写道,“27号勃拉姆斯从维也纳赶来,他看起来气色很好,他总是这样的。星期天,28号晚上独自在家,和勃拉姆斯谈了很多在黑尔特勒出版社出版舒曼作品的事;可他不是个能驱散我顾虑的人。相反,他总是说,校对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印刷师总会弄出新的错误。如果事情是这样的,那真是很令人失望!因此他一点也不赞成尽快出版,而是认为要有耐心。照这样的话,一件原本两年就可能完成的事,我却得拖上个六七年!这件心事让我的生活失去了乐趣!一次又一次看到钢琴上躺着校样,可我又总没时间去看它,真让人受不了,同时出版社还不停地来催促!……”

几个月后,坐落在波恩墓地的罗伯特·舒曼纪念碑揭幕,克拉拉·舒曼为此而感到高兴,她亲自出席揭幕仪式,那是在1880年5月2日。只是她高兴的心情蒙上了一层伤感的阴影,她

也想到了自己的死亡：“11 点半揭幕式开始，天公作美，没下一点雨，淡淡的云遮住了太阳的脸，人们觉得这是个舒适的日子。这是一个庄严的仪式，高兴和忧伤同时涌上我的心头，但是忧伤还是遮盖了高兴和振奋的感觉，占了上风。我很感激命运的安排，感激它还让我有机会参加这个仪式。一切都安排得很感性很好——当纪念碑被揭开，高级合唱团奏响曲子的时候（可惜只有吹管乐，教士说歌词不是基督教的），情形十分感人。整个仪式的气氛很庄严，看起来所有的人都是全神贯注地站在那里。一个念头盘旋在我脑子里不肯离去：不久我的孩子大概也会携着我的棺木走同样的路……”

这导致了她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把和罗伯特来往的书信都拿出来重读了一遍：“现在我每天都在读我俩的通信，陷入一种无法言说的悲情之中，因为读信的时候，我心中又燃起了对他——一个最高贵、最神圣的人——的热爱，感受到了失去他的烈痛……”

1881 年 4 月克拉拉·舒曼被推举为皇家音

乐科学院荣誉院士，在这之后她第十次巡回演出来到伦敦的“大众”剧院，她描述当时的场面时写道：“又是人满为患，结果数百人只能无奈地离去，我每次演奏时都是如此。”

在德国，年逾花甲的她受到同样热忱的欢迎。比如 1881 年 12 月 14 日慕尼黑的“奥德翁”剧院的情形：“这是我有生以来受到的最热烈的欢迎之一。钢琴用四个巨大的花环装饰着，一个是慕尼黑青年会的（大学生），一个是音乐机构的（乐队）……刚刚演奏完音乐会的第一乐章（罗伯特的 D 小调），台下就响起了持续的掌声，我不得不一次次鞠躬致意……”

两年后克拉拉·舒曼又一次来到伦敦，这是她第一次在一个公开的音乐会上演奏罗伯特·舒曼升 F 小调的奏鸣曲：“紧张了一整天之后，晚上的奏鸣曲十分成功，演奏变得一点儿也不难，观众们显然被感染了……”但是紧接着她又担心起来，害怕自己很快就再也无法胜任这样的挑战了：

“但是这天夜里却非常恐怖；一直到早上 5

点我都没有合眼，满脑子尽是瘫痪和肺病，因为我的胸部老是疼痛，最后我以这首奏鸣曲来结束我的艺术生涯，我这么想已经好些天了——这会是一个美好的结局——但是这个乐曲我还想要再演奏几次！”

四天后她在日记里写道：“身体很弱，全身神经都痛得厉害。我担心明天演奏不了了。虽然医生认为，只要一顿配有香槟的丰富晚餐，就可以使我完全恢复体力。他说，昨天和前天我都在发高烧。”

一星期后，地点还是在伦敦：“一夜不成眠，非常虚弱。不过睡了一个午觉后，我又振作起来了。给汤普森夫人演奏了一会儿，一起做了晚饭，甚至在晚饭后还弹琴了！许多可怜的女教师再次找上门来，可我应该怎么帮她们呢！她们总是以为，我认识整个伦敦，我只需把她们作为教师推荐出去就成了。看着她们再次离去，我的心常常会很痛——她们中间有些人几乎没有饭吃。”

至此，克拉拉·舒曼还是下不了决心自动结

束她灿烂的钢琴家生涯。三年后,克拉拉·舒曼六十八岁了,在“瑞典的夜莺”詹妮·林德逝世那天(享年六十七岁),她在日记里写道:

“87年11月10日,詹妮·林德如今也走了,同时带走了一个我最美好最深刻的回忆。她的死又让我记起了我的年纪,我自己也已经一只脚踏进了坟墓……不久以后,当所有这些同代人都走进了坟墓,还会有谁记得起詹妮·林德,还会有谁再怀念她卓越的艺术,怀念她不凡的天赋?每一个再生产的艺术家都将是这样的结果!”

几个月后,六十八岁的克拉拉·舒曼到英格兰作最后一次巡回演出。1888年3月26日,她在日记里说:“还是上次的‘大众’剧院——仍然那么紧张,但是漂亮地以罗伯特的《第一钢琴奏鸣曲》终结——我相信,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演奏过它,然而我已经决定,这次该是向英格兰告别的时候了,所以我的悲伤无以言表。自愿地终止一件还能够继续做下去的事,是多么的艰难啊!不过这样做肯定是对的,对于这一类的抗

争,我的身体再也承受不了多久了,这我感觉得到……”

接近古稀的克拉拉·舒曼此时却也要为她的经济来源操心,因为她不想再出远门举行钢琴音乐会,她的收入自然就减少了。虽然她自己不需要很多钱,但是她得资助她的几个孩子和孙子。她的大儿子路德维希,生于1848年,已经卧病在床多年了,在确诊为“不治的精神病和脊髓炎”以后,1873年以来一直住在莱比锡附近考尔尼茨的公共疗养院里。克拉拉在她的日记里谈及路德维希时写道,他“有如活埋”且“毫无意识”了,除了“他在呼吸”,人们便对他一无所知了。她每个季度给路德维希寄去住院费和治疗费,在1889年的遗嘱里她留给了他应得的财产。1899年路德维希死在疗养院里,届时五十二岁。

几个儿子都没有给克拉拉·舒曼带来幸福,关于这一点,她至今的所有传记都只字未提,直到最近,爱娃·魏塞威勒尔才对此作了描述。克拉拉的小儿子,“令人担忧的”费利克斯,罗伯

特·舒曼未曾谋面的孩子，在陌生人家度过了童年的大部分时光，多数时间待在柏林。后来他想当一名音乐家，可惜患有肺结核，不能每天练习几个小时的音乐。于是他转而在海德堡学法律，但迫于疾病又只能退学。他到瑞士求医，同时写诗。奇怪的是，克拉拉阻挠费利克斯发表诗歌，因为她怕有损舒曼家族的名声。勃拉姆斯倒觉得他的诗写得不错，他甚至为其中一首题为“我的爱绿得像丁香的花束”的诗谱了曲。费利克斯死于1879年2月，终年二十五岁。

克拉拉的第二个儿子费迪南德生于1849年，是个银行职员。他违背母亲的意愿结了婚，成了六个孩子的父亲。但是不幸他迷上了吗啡，可能是1870/71的普法战争给他留下的祸根。他不得已参加了这场战争，在这个过程中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为了止痛，他只能服用镇定剂。80年代中期，他曾到不同的疗养院接受治疗，可惜没有地方能够救得了他了。他死于1891年夏天。克拉拉·舒曼一直都在供费迪南德的六个孩子上学。在遗嘱里她把费迪南德应

得的遗产交给了这几个孙子。

不论克拉拉·舒曼是真的遇到了金钱方面的困扰,还是只担忧有一天钱会不够用,她肯定是跟勃拉姆斯谈起过她的心事。1888年7月24日他向她提供援助:“我真心地分担和你有关的一切,包括你的一切烦恼和痛苦,在这样一种丰富的生活中,烦恼和痛苦是无法避免的——而你甚至遭遇了大量的不顺。金钱方面的烦恼我觉得是小事,不大去想象它,去操这份心。但令我恼火的是,你也会有经济拮据的时候——可我则在钱堆里打滚而丝毫没有觉察,同时也没有因此而感到什么快乐。我不能够、不喜欢、也不愿过另一种生活;再多给我的家人钱是没有意义的,需要我真心相助的地方,我会心甘情愿、不惜代价地相帮。死后我不再有义务或者特殊的愿望。总之,情况很简单。

可这些天我又在想,我怎样才能给你寄一笔钱呢?以富裕的艺术之友的名义匿名发一封信件,或者往舒曼基金会里追加一笔款项,或者用其它的方法。我必须先和一个可信赖之人商

量,以了解什么是正确的方式,然后才能去做。

相反的,如果你能实事求是地肯定我是个好人,如果你能如我所希望的那样喜欢我,——事情就好办多了,你会毫不犹豫地同意我从剩余甚多的钱库里拿出 10000 马克寄给你,分担你花在儿孙身上的费用。”

勃拉姆斯继续写到,出版商又从他手里拿走了“一大堆合唱曲、四重唱曲和歌曲”,他还说:“酬金很丰润,我却啥都没发觉,新来的酬金总是毫无声息且别无用处地转入银行——现在你想一下,如果你对我说一个完美可爱的‘好’字,这些乐曲和酬金将会带给我多大的乐趣……”

只过了三天,克拉拉·舒曼就回信说:“最亲爱的约翰,你给我提供如此友好的帮助,我该说些什么呢?读你的信时,我无法抗拒内心最深处的感动。——语言太苍白了,它无法表达出人们在这种时刻的感受,因此我只能真诚地和你握手,向你坦白,你提供的帮助让我放了心,我已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可我现在不能接受你

如此感人的帮助,没有一个真正重要的理由,我就接受你的帮助,是不合理的。靠在英格兰的演奏,包括去年的和今年的,我赚了些钱,应该够今年花了……另外我一直还在和别人商谈出售罗伯特的原稿一事,我想最终会成交的,所以暂时我还不需要动用我的资产。我的忧虑多半源于未来的日子,靠举办音乐会赚钱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费迪南德孩子的开销却越来越大。因此我决定向你承诺,一旦我真正遇上经济上的困难,我就向你开口,因为我认为你是个好人,就如同你本人那样,我喜欢你正如你所希望的那样。这样你满意吗?请你相信我的承诺,因此我希望也请求你暂时不要为我做任何事。——你忠实的老克拉拉。”

勃拉姆斯等了两个月。然后他给六十九岁的克拉拉回信:“如果我故伎重演,请你不要不开心。在夏天的时候,我就想给你寄钱来,可你却百般友好地拒绝了,现在趁我俩都在家,我决定拿这笔钱再冒一次险。所以当我明天以最诚挚的心给你献上 15000 马克(加上利息和利息

的利息)的时候,请你笑纳。——我从内心里祝你一切都好,而且求你不要不高兴,你应该非常友善地看待这件事。你忠诚的约翰。”

克拉拉·舒曼生命的第六个十年就这样慢慢地消逝了。或者准确地说,随着 1889 年 9 月 13 日生命中新的一年开始,她的六旬才真正地一去不复返了。“它终于来了,七十岁的生日——我应该为此而高兴吗?”她在日记里写道:“只是一种忧伤的高兴罢了。浓浓的爱意包围着我,可我们又失去了多少爱啊!——对一个女艺术家来说,走进老年也不是件易事。不过有了孩子和朋友对我的爱,这一天最终还是成了一个欢庆的喜日。装满鲜花的礼盒望不到边,巴登女大公爵送来一个大花篮,插满了世上最鲜艳的玫瑰,是第一批到来的礼物之一,另外还有一封感人的信。让我又惊又喜的则是威廉皇帝颁发给我的一枚艺术奖章,很大,是金的。电报整天接连不断,女皇,安娜·冯·黑森等等都给我发了电报……”

就在这一天,步入古稀之年的克拉拉在日

记里写下了一个心愿，以此结束了她写日记的生涯：“今天想去睡觉的时候，我只想提一个请求，一个想法，为了我孩子们的幸福，希望上帝能让我再健康地活几年，不要让我长年重病，而要让我拥有享受的能力，就像我的心还拥有这种能力一样。”

上帝成全了她的这个愿望，在那之后克拉拉·舒曼又活了足足七年。



约翰·沃尔夫

冈·冯·歌德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

“父亲在这把年纪千方百计想留住儿子，不让他参军，我觉得很自然；毕竟这是他从家庭生活中可以获得的惟一乐趣。……”

舔犊情深

——歌德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德国作家，公认的世界文学巨人之一。集文学艺术、哲学、政治等成就于一身。代表作《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列那狐》、《诗与真》、《亲和力》等。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于1749年8月28日出生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他向来只在情非得已的时候才会想起自己的年龄，想起自己渐渐变老，同样，他似乎有意逃避了六十岁生日。不管怎样，看起来他好像不想让六十岁这一天到来。1809年8月28日的五个星期前，他就——这早已成为他的嗜好了——隐退回了耶拿，那里的宫殿里有他的一个工作室，类似办公室，可以远离魏玛家里的喧嚣。他刚写完长篇小说《亲和力》，但还想把草稿从头到尾看一遍，编

审一下,有些地方还要修改修改。为此他需要宁静与和谐,像他给冯·施泰因夫人的信里所说的那样。

六十岁的生日他从没在日记里提过。1809年8月28日,他只记了以下内容:“我的妻子带着女仆,沃尔夫,恩格斯以及埃尔泽曼到了。上午跟他们几个人一起过,中午和同样这些人以及冯·克内贝尔先生一起吃饭。吃完饭,他们就告辞了,晚上待在冯·克内贝尔家里。”

不过从他没有提起修改稿子一事可以看出,这一天跟往日、跟随后的许多日子还是有所不同的。生日的前一天他说:“改写了第二部分的第三章,还校对了其它一些地方。”生日之后的一天他说:“审查第17卷,口头修改第12章。”像这样,《亲合力》的加工工作还延续了很长时间。9月20日,也就是生日过了三个星期之后,歌德还待在耶拿,他写信给克里斯蒂娜:

“做完以前打算做的事,我至少还需要八天的时间;不只是为了修改小说,我需要静心,我还要回复这段时间积累下来的信件,以及处

理其它的一些事情。如果你们”——他指的是克里斯蒂娜和他刚旅游回来的儿子奥古斯特——“自己先消遣一下，我会非常高兴；我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赶紧把该办的事情办完，以后，陪你们玩的时候就可以无忧无虑了，只要这么想，你们就会开心了。所以我恳求你，替我谢绝一切来客……”

显然，歌德对一些朋友想前来祝寿的事一点也不感兴趣。也可能是因为他早就不觉得六十岁生日是件意义深远的事，是五旬和六旬之间的重要转折点。大概是接近花甲之年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看作是六旬的人而不是五旬的人了。十一个月前，拿破仑问及他的年龄时，他的回答就证实了这一情况。那是在埃尔福特，1808年10月2日。

“我被传唤入宫……皇帝正坐在一张大圆桌旁吃早餐，右边离桌子较远的一侧站着塔列朗，左边很近的一侧站着达姆，皇帝和达姆正在讨论军税的事。皇帝示意让我走近他。

我挑了一个离皇帝适中的地方站下。他仔

细打量了我之后,说:

‘您是个男子汉。’我鞠躬致谢。

他问:‘您多大年纪了?’

‘六十岁。’

‘您保养得不错——您写过悲剧。’

我捡最重要的回答……”

此时自称是老人的歌德被四十岁的拿破仑吸引住了,拿破仑在跟歌德谈论文学,尤其是《维特》的同时,十分自如地接待了来往不停的军官和其他访客,向他们发号施令,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统治着整个世界。然后他又把注意力转到歌德身上,问“我有没有家庭?有没有孩子?以及其它一些平常人感兴趣的私人问题。同样,他还问到了我跟君主家庭的关系,例如跟阿马莉娅公爵、跟君王,君王夫人等等;我用一种自然的方式回答了他的问题。看起来他对我的回答感到满意,并为自己译成了他的语言,只是比我刚才表达的语气要果断一些。

这里我必须说明一下,在整个谈话过程中,他所用的表示赞同的表达方式之多,着实让我

佩服；因为他很少僵坐着只听别人讲话，他要么有所思地点点头，要么说‘好的’，或者甚至说‘很好’或者用其它类似的词；另外我还得说明一下，他说完话之后，会习惯性地问一句：‘歌德先生，您说呢？’

于是我看准了一个机会，作了个姿势问宫廷总管，我是不是可以告退了？他同意了，我便立即向他告辞。”

这篇关于他和拿破仑在埃尔福特见面的长达数页的文章，是歌德十五年之后才根据当时的提纲式记录写成的。此时的歌德一如既往地迷恋着拿破仑。甚至到八十岁，他还是这个样子。有一次跟艾克曼谈到了拿破仑，歌德说：“是的是的，亲爱的，这是个我们的确无法模仿的人。”

虽然六旬的歌德处于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但这没有影响他潜心写作，这一时期他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生命的第七个十年里，他出版的书有《亲和力》，《色彩学》，《诗与真》的三个部分，《东西合集》，《意大利之行》的第一、二部

分。他生命的第七个十年接近尾声时，他把1815年以来出版的作品编成了《歌德文集二十卷》，与世人见面了。

年过花甲的歌德能如此专注地埋头于写作和自然科学研究，还有一个原因是他感到越来越寂寞了。当他与年轻的一代，尤其是浪漫主义一派，越来越疏远的时候，他身边的许多亲人一个接着一个去世了：席勒死于1805年，阿马莉娅女公爵1807年，母亲1808年，威兰1813年，还有他的妻子1816年。有时他认为，自己也已经“站在了今世的边缘”上。

但从根本而言，六旬歌德的心还是系在魏玛弗劳恩普兰大街旁的房子和他的小家庭上，系在期间变得委实很胖的妻子克里斯蒂娜身上，系在儿子奥古斯特身上。

这个十年开始的时候，奥古斯特还在耶拿上大学。他满二十岁时，父亲歌德竭力想帮他在魏玛政府机构里找个职位。歌德认为，耶拿的学业栽培不了他的儿子。耶拿的学生不听话，甚至有些叛逆。为此歌德于1810年10月8日给他

的一个公爵朋友,写了一封长信:

“事关我那快满 21 岁的儿子奥古斯特,我想请您帮他找一个法院陪审推事的职位。这里我简要地说明一下我儿子的情况,他从小就接受了一些教育,有一年半的时间在海德堡致力于法学学业,因为法学是商业活动的基础;现在他要在耶拿继续攻读一年,同时还努力消化在财政学和经济学课上学到的知识,另外,他性情稳定,品行可嘉。但是这一切都不会令我求他在耶拿大学再呆一段时间,然后到本地的一个财政职员处从头开始学做经商。

因为,我之所以有些仓促地提出这个愿望,是因为我儿子在耶拿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学生中间有些比较出名的组织,以同乡会、秘密修会、宗教团体、茶话会、大筵席等形式组建起来后,便开始相互攻击,挑起殴斗和爆炸事件,然后被阻止、被镇压,却没有一次被斩草除根。在我的提醒下,我儿子在海德堡求学的时候就彻底了解这些情况了。所以在耶拿,他有意克制与他人交往,自然就被孤立了,可又不得不对所有

的派别佯装友好,虽然做得很聪明,但这种处境对他来说既不愉快也不安全……

正因为如此,我恳求殿下您尽快给他施舍为他准备的那份恩赐。只要有人把他从学生的队伍中提拔出来,他就不会再有烦恼了。冬天的夜晚,他就可以坐在由教授、侯爵侍从、商人和其他一些立世的男人组成的交际圈里,聆听一些经验,增长一些知识。而且对他来说,殿下如果能够较早地给他确定一个他能实现的目标的话,那也将是个不小的生活动力。他实际上是个比较讲究实际的人,在迄今为止的生命旅程中他也算是理智的,能干的……”

五天之后,当公爵通知歌德,二十岁的奥古斯特已经被封为“法院陪审推事”时,这位操劳的父亲感激万分。虽然这还只是个称号,不是一个真正的职位,但是这个称号意味着,不久奥古斯特就会被任用。歌德请人给他的儿子量了一身宫廷服,10月21日奥古斯特就已经可以穿着这身宫廷服首次参加宫廷大宴了。

奥古斯特继续以学生的身份在耶拿呆了将

近一年之后，父亲歌德就急着把儿子的职位固定下来，而且要求工作地点定在魏玛，这样儿子可以同时作为法律顾问帮他的忙，替他处理大部分的来往信件。于是他又写信给公爵：“在您替他找了陪审推事的职位之后，现在我希望我的儿子能在我身边待几年，一来我在有生之年还能对他有所帮助，二来可以通过相处和有的放矢的教训继续对他的培养。但是一切都还是不够，如果不让他去实践，如果没有人直接地向他指出他真正的追求目标，他不会从内心里感到一定程度的迫切性，要更快地朝这个目标努力的迫切性。”

之后不久，在二十二岁生日的前两天，1811年12月23日，奥古斯特接到了一项任命状，他终于成了宫廷律师委员会名副其实的陪审推事。他不需要参加考试。次年他就上任了，不过他还留有足够的时间做自己的事情，即代替父亲出席各种场合，参加礼节性拜访或者葬礼，歌德自己原则上是不参加任何葬礼的。他一辈子也不愿看到让他想到生老病死的场面。

年届六旬的歌德也会害怕死亡和病魔，但在整个德国起来反抗拿破仑统治的时候，他不是替自己害怕，而是替现在对他来说越来越不可缺少的儿子。因为像许多青年男子一样，奥古斯特也把名字写上了自愿军名单，准备奋起反抗拿破仑的统治，因为拿破仑此时在莫斯科已经一败涂地了。几乎所有的魏玛贵族青年都自愿报名参加起义。

六十多岁的歌德对此非常担心。他现在不愿意让儿子离开自己。但他又不能把儿子成天拴在家里，于是他就建议公爵派奥古斯特作为随从人员一起到法兰克福参加谈判，魏玛的一个法院理事会正要在那里商量军队伙食费事宜。公爵同意了，写信给歌德说：

“我亲爱的朋友，非常高兴看到你的奥古斯特也报名参加了自愿军。这一决定给他良好的意志和信念罩上了荣光，让他与兄弟们在思想上共同进取。——所以他的名字仍然可以挂在自愿军名单上，但是这几天……他就作为调遣人员前往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



以后,我们会看到,他的意志将引导他到哪里的,因为这次起义的指导原则是:让青年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做事。”

歌德给公爵回了一封很长的感谢信,虽然公爵的最后一句话撩起了他心中的不安。他根本不想看到有一天奥古斯特会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对他来说最保险的方法就是设法帮儿子奥古斯特搞到世袭公爵手下传令兵的位子,这样奥古斯特十有八九还是待在魏玛,因为他同时又是战时后备军的司令员。公爵再次满足了朋友歌德的这一愿望,但回信时语气显得有些生硬,而且禁不住对奥古斯特进行了一番挖苦:

“我的儿子,自愿军的首领,将等奥古斯特先生从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回来之后封他为身边的传令兵,只要这个年轻人喜欢待在这里。”

事情果真这样发展了。当其他自愿军出师到弗兰德尔恩的时候,从法兰克福回来之后的奥古斯特却待在魏玛世袭公爵的身边做传令兵。许多人都觉得这种做法很卑鄙。席勒的儿子卡尔也跟着自愿军开拔了,看到奥古斯特的情

况之后席勒的妻子写信给梅克伦堡的世袭公主,也就是原先魏玛的公主卡萝莉说:

“父亲在这把年纪千方百计想留住儿子,不让他参军,我觉得很自然;毕竟这是他从家庭生活中可以获得的惟一乐趣。而且儿子自己也没有什么参军的动机。这样做父亲很开心,儿子也没啥不开心,两全其美,所以我也没觉得有啥不好。但是确实有些人对此摇头耸肩。而我,即便会伤心致死,也绝对不会阻止卡尔去参军,因为不然的话他的整个生命,他的整个精神将毁于一旦;他会因此变得很忧伤。但是奥古斯特本来就没有参军的动机,因此我替他的父亲感到高兴,因为他的意向和父亲的快乐是吻合的。”

奥古斯特确实是非常犹豫地让别人替他在自愿军的名单上签名的。没有任何东西吸引他参加斗争。他愿意呆在家里。只是如冯·施泰因夫人笔下所写的那样,他成了惟一赋闲在魏玛的青年:

“像人们所说的,歌德不愿让儿子跟着自愿军一起出征,于是儿子成了惟一呆在家里的有

地位家庭的青年。他父亲似乎对我们现在的高涨热情无动于衷；人们不可以在他面前谈论政治。”

六旬的歌德确实不是德国民族起义的朋友，当普鲁士早就决定奋起反抗拿破仑统治的时候，歌德还是一如既往地崇拜着拿破仑，胸前依旧佩带着拿破仑颁发给他的雇佣军军团的勋章。至于那些最优秀的青年自愿去抛头颅，洒热血，他就更是反对了。在这一点上，他和他的多年知交，维·福格特大臣的观点是一致的，福格特说得非常明白，这是场“由青年们燃起的烈火”，人们必须阻止它的蔓延。他认为，受过教育的青年参加出征是没有必要的；人们完全可以派农家子弟上战场，他们会一样出色甚至更出色地完成任务。在耶拿，报名参加自愿军的恰恰是那些最优秀的学生；所以人们必须设法留住他们。

虽然，当歌德的朋友克内贝尔的儿子也去报名参军的时候，歌德写信给克内贝尔道：“越多的年轻人有志于在军事方面发展……越好。”

但是他又补充了一句：“我建议你在常规军队伍里替儿子找个职位，因为这是支受人敬仰的军队，人们不会因为它是它的一员而感到羞耻。”

歌德对各地纷纷组建的自愿军军团不以为然，包括后来闻名一时的吕措狙击射手队，年轻的科尔讷参加的就是这个军团，歌德还亲眼目睹了整个参军过程，因为当时他正在德累斯顿拜访科尔讷一家。恰恰是吕措狙击射手队的士兵给魏玛政府以及魏玛民众惹来很多麻烦，因为他们在萨克森—魏玛自行组织反抗法国人，而且还在公爵自以为仍是拿破仑的同盟者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行动了。法国人认为，魏玛上层应该对吕措狙击射手队造成的一切损失负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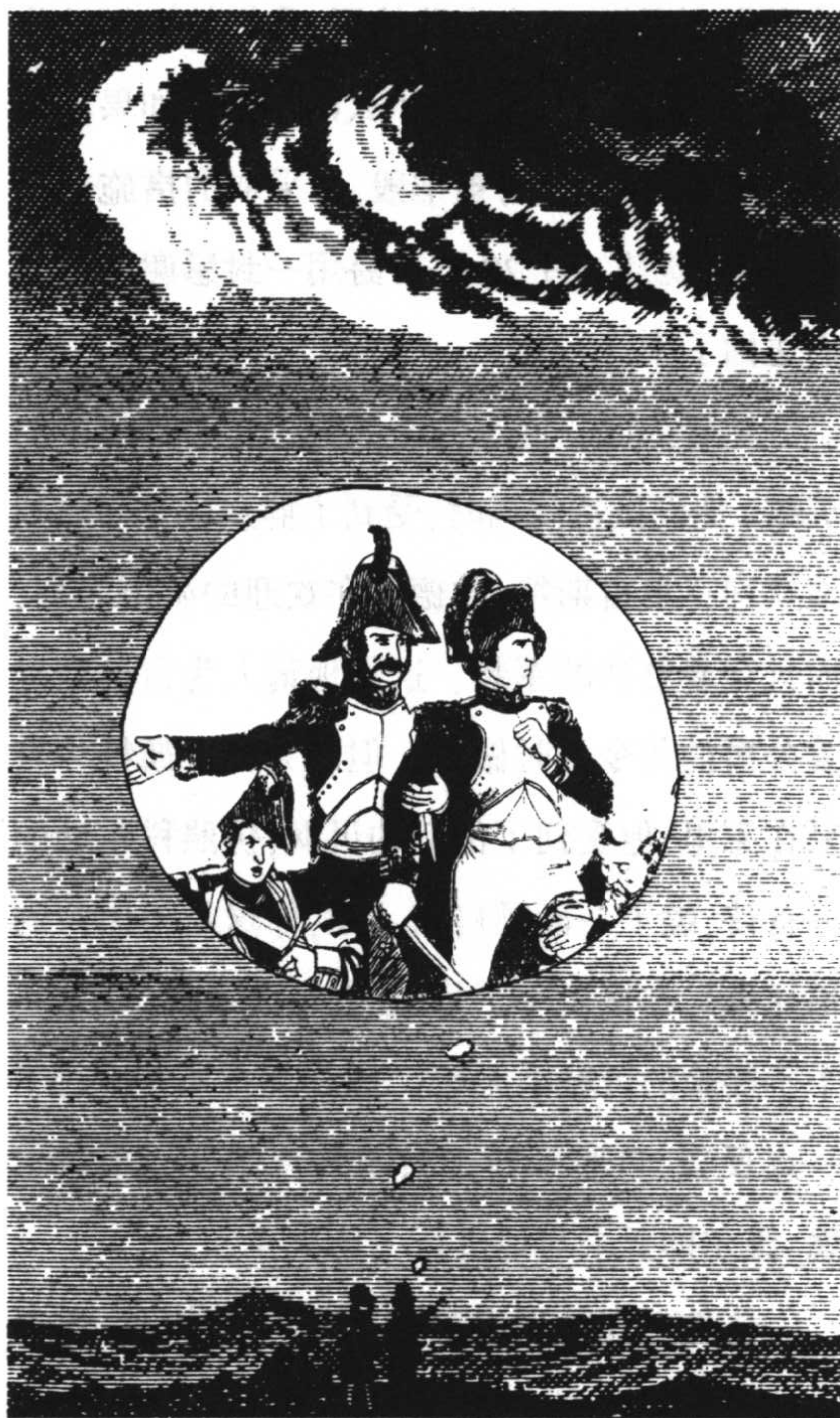
对六旬的歌德来说，这些没有经过专门的军事培训、只会毫无组织地发动一些小战争的自愿军只代表着骚乱。由此，他还进一步认为自愿军干不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他说：“如果自愿军能够发动各家各户的人民群众参加斗争，如果他们不是用他们尚未熟悉的军事斗争，而是用精神去团结人民，那么我会对他们顶礼

膜拜的。”这实际上是一个表达巧妙的抗拒词；因为发动人民群众起来斗争是不可能的，而且精神的旗帜能不能真正代替士兵们还没精通的军事斗争，从而领导群众也是一个问题。

没有多久，1813年夏，特奥多尔·科尔讷就已经战死沙场了，还未满二十二岁。正是他的死使六十四岁的歌德对自己独生儿子的担忧显得更为自然了。在那年的最后一天，像他自己说的，在那“悲哀而又恐怖”的一天，他给福格特大臣写信：

“几乎这一整年里人们都被真实的恐怖事件包围着，所以人们的肉体和精神都蒙上了忧虑的色彩，以致于人们在非常宁静的时刻会突然被某些恐怖的事件惊吓，没有特别的原因就会感到内心的震惊。人们甚至不敢拆信，因为他们害怕信封里面等待他们的是一个朋友的噩耗或是一个所喜爱的家庭绝望的消息。”

1814年5月，曾被派往比利时的自愿军回到了家乡。他们没有被派去打仗，因为没有人敢用他们。还在3月，他们中的狂热者之一，基舍



尔教授，就从布鲁塞尔写信回来：“我们军团的情况很不理想；三个人跑掉了，我们的旗帜被收了起来……我们的军官什么都不会。如果不采取措施，那么一切将被摧毁。”采取的措施却只有一个，就是4月20日公爵用一封感谢信把他们送回了家。

尽管如此，回家的士兵觉得自己是凯旋的英雄。他们抵达魏玛时，受到了群众诚挚而热烈地欢迎，奥古斯特·歌德也在欢迎的队伍之列，而且穿着整洁的军装，这是他请人为自己当世袭公爵的传令兵时做的。但因为奥古斯特一直呆在家里，他受到了他们的讥讽，仿照科尔讷的一首诗，编了一段顺口溜：“呸，你这足不出户的怕死鬼！在佞臣手下呆，在女仆身后挨，真是一个不要脸的可耻小无赖！”因为奥古斯特进行了一点反驳，自愿军骑士兵团的首领，冯·韦特尔恩-维尔即要求与他进行一场决斗。

这件事在魏玛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公爵夫人也获知了此事。她立即通过她的一个宫女通知歌德，此时的歌德恰好不在魏玛，他应柏林方

面的邀请正在离魏玛不远的贝尔卡疗养地创作一个爱国主义的庆典剧本。他给来信的宫女写了一封回信：

“尊敬的朋友，感谢您给我的忠告，同时我也希望您能代我作转达。请您代我向公爵夫人请求宽恕，并向至高无上的她说明以下情况：我的儿子并没有被殿下送回家中，而是被派做了王子身边的一个传令兵，他按时完成了自己的分内之事，而且在王子的亲口命令下才让人做了一身军服，总之，他没什么过错。我希望人们能够接受他，能够向他的同伴以及少年时期的朋友讲明这个情况，使他们和好如初。——福格特和格斯多夫先生一定会伸出援助之手，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帮我解决这场纠纷的。”

维·格斯多夫议长果真非常妥善地处理了这场纠纷。在此之前歌德还给福格特大臣和维·米勒政府密使写过信，维·米勒马上赶到贝尔卡，跟歌德讨论具体情况。六十五岁的歌德这下可以宽心了。但是谁也无法估计，歌德插手这一切是否真的帮了他二十四岁的儿子一个大忙。

可能他救了儿子一命,如果真的进行决斗的话。但有一点很确定,那就是自那以后奥古斯特在魏玛被严重孤立了。“人们对着他耸肩;人们躲着他,”他的传记作者威廉·博德写道:“日常的舒适的人际交往已经成为历史。”他有一段时间曾经爱过的奥蒂莉厄·冯·波格维施现在也不想和他有什么瓜葛了。她爱上了一个从莱比锡战场凯旋而归的英雄,他受伤之后来到魏玛,在那里呆了几个月。不过这同样也会过去。

夏天,歌德踏上了前面提到过的旅程:美因河,莱茵河和内卡河之旅。他写信把旅行情况详细地向他的妻子作了汇报,并感谢她“建议他到这一带看看。泥土、天空和人都别具一格,一切都很开朗,让我觉得一天比一天舒适。”分别了很久之后,他又看到了他的故乡法兰克福:

“我坐车进了法兰克福城,星期五的夜晚……,整个城市灯火通明,而我……为这一美景而感动。我找到了一个栖身之地,没有惊动任何人,悄悄地来到旅店。接着我不去思考什么,而是由卡朗搀扶着”——指他的侍从卡尔·施塔德

尔曼——“在这个不夜城里来来回回地走。没有灯光的地方，月亮就显得分外耀眼。站在桥上，我惊讶于新起的楼房，可以发现四处的变化：什么地方更糟了，什么东西一如从前，什么是新出现的。最后我们走过我们的老屋。屋里的钟敲响了。这声音很熟悉，因为房子后来的主人又把它从拍卖会上买了回来，放在原来的地方。”

旅途中歌德迎来了六十五岁的生日。这个生日他同样也没有在日记里提到。次年他又沿着莱茵河，美因河和内卡河做了一次旅行，而且又碰上了维勒默夫妇，继续写他的《合集》和《意大利之行》。1815年5月31日他从威斯巴登写信给克里斯蒂娜：“我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很好，住得很舒适，但比较贵。吃得不错，而且很便宜。我已让别人从法兰克福寄葡萄酒过来，所以不久我就可以解决这一重大问题了。早上，喝了可口的斯瓦巴赫矿泉水之后，我就躺在威斯浴池里沐浴，这里的水有治疗作用，一切令我十分受益，我同时还可以做一些事……正值天气最佳的时候，只是对庄稼和花园来说有些

不利,他们已经十个星期没有淋到连绵的雨水了。不过正因为如此人们可以在这里吃到新鲜的豌豆了。可最令我欢喜的要数鲑鱼,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花 30 个十字币就可以在疗养院大厅里买到一份配有上等咖喱的鲑鱼。现在正是鲑鱼上市的时节。我惟一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吃得过多。欧洲甜樱桃也上市了,装在大篮子里,随处可见……。玫瑰彻底绽放了,夜莺时刻准备着为人们歌唱,所以人们很自然地能想象伊甸园的天堂美景。《合集》里也顺利地添加了新章节……”

他又一次在外面度过了整个夏天。每天的沐浴,日记里总是提到这一点,对他很有帮助。1815 年 8 月 28 日,进入六十六岁那天,他还在威斯巴登。直到 10 月 11 日他才返回家里。魏玛对他来说显得有些无趣。还在路上的时候,他就提醒克里斯蒂娜:“想一下,我们应该怎样丰富多彩地度过这个冬天。放点音乐将很受欢迎,因为音乐是教育整个社会的最纯洁、最舒适的方式。”信的结尾处他再次叮嘱他的妻子要为此

冬天想出一些花样来：“祝我真诚爱的人身体健康，别忘了想想冬天里的消遣方式。”

歌德和克里斯蒂娜健康地度过了这个冬天和第二年春天。奥古斯特的状况也非常理想。1815年圣诞节，二十六岁生日的时候，奥古斯特接到了任命状，被任命为宫廷理事会成员，每年的薪水是800塔勒。而且他和奥蒂莉厄·冯·波格维施也重归于好了。这样弗劳恩普兰大街上的大家族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可是突然克里斯蒂娜病倒了，而且病得那么凶，以致于刚去耶拿的歌德不得不匆忙赶回家来。

早在1815年1月初的时候，克里斯蒂娜就在马车里中过一次风，不过马上又恢复了健康。在此之前她虽然很胖，但一直很健康，活得像个青春少女。四个星期后，她再次抽搐，突然之间就失去了知觉。不过这回她又一次起死回生。接下来是在1816年5月，她又得了类似的中风，几天之后却觉得没有任何问题了。5月31日她再次受到打击。6月1日，歌德在日记里说：“一整夜我妻子都处于危险状态。”

6月2日，他写道：“我妻子的状况越来越差。”——6月3日：“整夜忐忑不安，忧心忡忡。妻子又中风了，躺在床上。海根多尔夫的妻子守候在我妻子的身旁，我的妻子还是没有渡过危险期。”——4日：“我妻子的情况仍然很危险。”

在此期间他也病倒了：“突然之间发起了高烧。我不得不躺到床上。”6月5日：“整个晚上都躺在床上。我的妻子还处在危险期中……我的儿子是助手，参谋，成了这场混乱中惟一的支柱。”1816年6月6日歌德记了以下一段话：“我的妻子已快走到生命的尽头。她以她的天性正在做最后一次垂死挣扎。将近中午的时候她跟我们告别了。我从里到外都是空虚和死的静寂……夜里12点我的妻子被抬进太平间。整天我都躺在床上。”——6月7日：“没怎么睡好。无数的吊唁。下了床。”——到了6月8日：“清晨4点我的妻子入葬。”——克里斯蒂娜·歌德，原姓武尔皮乌斯，死于尿毒症，在她五十一岁生日过后五天。

此时的歌德处于生命的第六十七个年头，

现在他觉得更孤单了。克里斯蒂娜下葬的那天，他写信给布瓦瑟雷，他只在附言中向布瓦瑟雷简短地提及了他个人的痛苦：“附言：这些天我亲爱的娇小的妻子离我们而去了；亲爱的朋友们肯定理解我目前的状况。”

奥古斯特和奥蒂莉厄·冯·波格维施之间的关系在冷淡了很长时间之后，现在又恢复正常了，而且更牢固了，对此六十七岁的歌德感到非常高兴。他认为，奥蒂莉厄对奥古斯特非常合适，不过同时他又错误地以为，比起在他阴影下生活的儿子，奥蒂莉厄更喜欢、更尊敬他这位六旬的人，这位著名的、有教养的、智慧的诗人，这位父亲。1816年底奥古斯特和奥蒂莉厄订婚了。

柏林的朋友策尔特听到订婚的消息之后，替六旬的歌德描绘了一个与年轻媳妇一起过新生活的田园般幸福情景，一个大概歌德自己也渴望的生活：“一位年轻的女子走过来了，摸了摸老头的胡子，挠了挠他的耳朵，又在适当的时候从那里偷偷溜走，尝了一下汤的味道，往角落

里看了看,并用手指弹了弹灰尘”,然后让一辆车开到屋前,“把老小孩(指歌德)送到太阳下,让他尽情地呼吸新鲜空气”,她会“围着公公团团转,只要稍有不适不爽,她就会不声不响地出现,再建充满磁力的愉悦的共同生活……”

克里斯蒂娜的丧期满后,歌德家在 1817 年 6 月 17 日举行了婚礼,邀请的人甚少。三口之家的新生活似乎过得不错,无论如何从表面看来、从社交界的角度来看是这样的。老歌德终于有了一个门当户对的媳妇来掌管家门了,这一天魏玛的人们已经盼望很久了。奥蒂莉厄·冯·波格维施是一个能干的知识女性,她精通法语,而奥古斯特的法语则说得磕磕巴巴,就连歌德在法语方面也只是一般水平。克里斯蒂娜几乎从来不参加丈夫的社交生活,但是她在管理家政方面堪称典范。而奥蒂莉厄则一点也不懂家务和财政,也不会做饭。对钱也没什么概念。她最喜欢花钱买各种各样的新式小帽以及许多不值钱的小玩意和装饰品。这导致了不久以后她就和奥古斯特发生争执,因为奥古斯特想一个人

掌管所有的财务。“他不爱我,否则的话他不会在乎这些小事情的。”奥蒂莉厄写道。但是最终连父亲歌德也不能对媳妇的混乱家政视若无睹了。终于有一天,歌德从她手里取回了所有储藏室、柜子和箱子的钥匙,自己来分配支出和收入,因为他再也无法容忍奥蒂莉厄把整幢房子搞得乱七八糟的样子了。不过那时的歌德已经走进了七旬。



卡斯珀·大卫·弗里德里希

Caspar David Friedrich

1774—1840

“我迫不及待地想看作品完工后的样子。不过我能重新开始画画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这让我有理由相信，以后我又能挣来每天的面包了。”

命运的瞬息变化

——卡斯珀·大卫·弗里德里希

卡斯珀·大卫·弗里德里希：德国浪漫主义绘画的先驱。在把悲观主义和崇高的观念作为浪漫主义运动的中心课题方面起过重要作用。作品有《北方之光》、《生命的不同阶段》、《雪中的教堂》等。

许多人都想像歌德一样逐渐地步入老年。但远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这一天。命运的瞬息变化会使许多人的计划一下子落空。1774年9月5日出生在格烈弗瓦德的画家卡斯珀·大卫·弗里德里希可以算是这些人中的一个。

弗里德里希的父亲是制皂兼抽蜡工，早先的时候，弗里德里希上过哥本哈根艺术学院，24岁时迁居德累斯顿，并作为自由艺术家在那里安了家。50岁的时候，他被任命为德累斯顿皇家艺术学院的教授。尽管他很勤奋，而且他的艺

术,尤其是在风景画方面的造诣颇为人道,但他还是富不起来。他的收入只够家庭的支出,余不下什么钱。

这很大程度上要归根于他的固执;他从来不愿随波逐流。卡斯珀·大卫·弗里德里希是个独来独往的人,学院同事之间的尔虞我诈令其长期深受折磨。在他通过几年的苦干完成了巨作(《生命的不同阶段》,《燃烧中的新勃兰登堡》,《北方之光》,《回忆崇山峻岭》)之后,年届花甲的他以为终于可以得到安静,不再受敌意困扰地创作了。可就在这时,刚满六十岁他便中了一次风,胳膊和腿瘫痪了。

这是在1835年6月。起初的时候他只能躺在床上。不过不久之后,他的病情就有了一些好转,8月的时候他可以外出到特布里茨的波西米亚式温泉疗养地进行疗养治疗了。疗养结束后他写信给他的侄子海因里希:

“在医生的嘱咐下我在特布里茨待了6个星期,原因你是知道的。前天我又回来了。现在我可以很好地用双脚站立,希望温泉也能让我

的手恢复工作能力。整个疗程中天气都非常好，特布里茨周围的环境也非常漂亮。因为手半瘫痪了，所以能画的东西不多，但我想，等我的手恢复画画能力之后，这些东西会有用处的。”

可惜，手已不可能彻底康复了。也就是说，他虽然可以绘图，因为绘图时手只需平放，但是已经不能画油画了；对他现已瘫痪的手来说，画油画的要求太高了。他还可以非常费力地加工已经开始的油画，但是从整体上看，他改变了绘画形式，改画钢笔画和水彩画。1835年底，61岁的弗里德里希写信给俄国作家瓦西里·茹可夫斯基，后者对他的作品仰慕已久，还买过他的许多画，弗里德里希说：“过了很长时间我才鼓起勇气重新作画，当我出乎意料地发现头开得不错的时候，我很高兴。我迫不及待地想看作品完工后的样子。不过我能重新开始画画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这让我有理由相信，以后我又能挣来每天的面包了。”

可惜事情进展得太慢了。卡斯珀·大卫·弗里德里希于是陷入了经济困境。茹可夫斯基帮

他在俄国卖了几幅画，估计是卖给了俄国皇帝。弗里德里希写信给茹可夫斯基说：“看到已卖出去的作品目录，我很开心，相信您从中说了不少情，作了不少贡献。这张目录单带来的收益重新开启了我的希望之门，估计有一段时间我可以衣食无忧了，此外我又可以在来年夏天到特布里茨接受沐浴治疗了，这真令人宽慰。不过坦白地说，对完全治好瘫痪我已不抱希望；对此我也很平静，我很高兴而且也很感激上帝能让我恢复成现在这个样子。但我相信，温泉沐浴可以阻止病情恶化。”

其实，不只是瘫痪的手给六旬的他带来了苦恼，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几个星期后写给茹可夫斯基的另一封信中看出来：

“您的护士女士已经好心地来探望过两次了，但是第二次来的人如此之多，以至于我的房间里说俄语的、法语的、意大利语的、英语的和德语的都有。看到这么多来看望的人，听到这么多方言，我觉得自己很窘，因为我动不了腿，舌头也不灵，想顾及每个人，却一个也顾及

不到。”

接下来几年，弗里德里希的周围清净下来。同样生活在德累斯顿的御医卡尔·古斯塔夫·卡鲁斯教授因为也会作画，所以跟弗里德里希有密切的交往，1839年他在一封信里汇报了弗里德里希的情况：“谈到弗里德里希，他还凑合着过得去，中风使他瘫痪了，不能工作……朋友们共同资助他，他确实非常需要这些资助。”

这时弗里德里希六十五岁了。他已完全放弃了他的健康状况会好转的希望。1840年瓦西里·茹可夫斯基再次去看他的时候，弗里德里希“像个小孩子一样哭了”。他对茹可夫斯基说，沙皇答应过在危急时刻帮助他，现在他需要沙皇的帮助；他不能工作了，他快死了，只能留下妻子和儿女生活在贫困中。那以后不久，在1840年5月7日，卡斯珀·大卫·弗里德里希去世了。沙皇的捐赠费在他死后才抵达德国，这给弗里德里希德的遗孀和两个还住在家里的孩子帮了很大的忙。



威廉·福格特

Wilhelm Voigt

1849—1925

“若不是送上门来的请求，保险箱现在还可能安静地留在克佩尼克……”

送上门来的金库

——福格特

威廉·福格特：曾经当过囚徒，几乎半辈子都在狱中度过。以“克佩尼克上尉”这一历史闹剧而闻名于世，并作为人物原型出现在卡尔·楚格迈尔的名剧《克佩尼克上尉》中。

也有人年上花甲还能开始过一种崭新的生活，这不是指那种退休之后或者衰老之后的晚年生活，而是指人生中一个真正的开始。曾经当过囚徒，并以“克佩尼克的上尉”而闻名于世的威廉·福格特获得的就是这样一种生活。福格特1849年2月13日出生于普鲁士的蒂尔齐特，父亲是个鞋匠师傅，十四岁的时候福格特离家出走。后来他说，这次出走是由家庭的不幸造成；父亲收入可观，但在投机中输了很多钱，于是整日酗酒。十四岁的威廉当时在上中学，出走

时很突然,没作任何准备,所以在路上偷了几件衣服。这成了他一辈子的祸害之源。

因为这次偷窃,少年福格特被送上了法庭,因为不久人们便把他逮到了。那时候还没有青少年犯罪惩治法案,所以他被当作成年犯对待;法院判他蹲几个星期的监狱。从那时起他就有了犯罪记录。导致的第一个后果就是,他被原来的中学开除了。所以他只能回到父亲身边当学徒,学鞋匠手艺。

学徒生涯结束后他去漫游。路上他收到了邮局寄给他的一张三个塔勒的汇款单,他就在“三”的前面加了个“二”,结果他就取到了二十三个塔勒。这种诈骗方式操作起来很简单,因此他重复做了好几次,最后一共骗了两百塔勒。当然诈骗最终还是露了马脚。法院判他“伪造证件罪,而且目的是行骗,并重复作案,属恶劣行为”,判刑十年,赔款 1500 塔勒,或者多坐两年牢。他没钱赔偿,所以只能选择坐十二年牢。这次的刑之所以判得这么重,是因为 he 有过相关的犯罪记录。

在莫阿比特单独监禁了三年之后，他又在宗恩堡监狱蹲了九年，这时威廉·福格特已经三十岁了。对劳改犯来说，要找到一份工作是很难的。最后他在埃尔福特的一家工厂里找到了一份工作。但是等到他过去黑暗的历史被揭晓之后，他只能放弃这份工作。他到国外待了几年，四十岁的时候又回到了德国，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他又多次被送上法庭，每次都受到严重的处罚。有一天他和从前的狱友抢劫沃恩格罗维茨的法院财务处。在卡尔·楚格迈尔著名的剧本里，福格特破门入室的目的好像只是想销毁他的犯罪记录，搞到一张官方多次拒绝签发的护照。实际上，他的真正目的在于钱。行动的时候被当场逮住，为此威廉·福格特再次遭到严厉的惩罚：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公民权利十年。等他坐完了十五年的牢，最后一天除外，他已经五十七岁了。他几乎在铁窗里度过了他的半辈子。劳改期间，他积攒了 228 马克。像以往一样，他再次尝试去开始一种正常的生活。

在监狱管理局的推荐下，他在威斯玛找到

了一份与他所学的鞋匠手艺相吻合的工作。但是过了不久,警察局就把他赶了出去,不止是赶出了威斯玛,而是赶出了整个梅克伦堡州。理由是他“对公共安全和道德生活构成了威胁”。在格劳登茨,然后在波茨坦,再后来在柏林,他同样遭到了相仿的待遇。他给许多城市的管理局写信,给他的故乡所在的城市写信,申请居留权,不过一切都是徒劳。没有一个城市愿意收留他。这样威廉·福格特想出了一个主意——他后来在庭前说——“他要利用军事手段扭转命运”。

他的这一场继而举世闻名的恶作剧——有别于楚克迈尔的描写——是经过一番细致的准备的:他在旧货摊上买了一套废弃的旧军服,然后在1906年10月16日把自己装扮成上尉的模样(从头到脚挂满第一近卫军团的徽章,带着白手套,挂着绶带,穿着远征靴,配着军刀),在街上拦截了正在巡逻的一列轻步兵团士兵和一连第4近卫军团的士兵,把他们控制在自己的掌管之下,带着这十个士兵从柏林坐火车赶到克佩尼克,占领

了那里的市政府，宣布已经逮捕了市长和出纳员（福格特凭一张发票要求他当面交出市金库里的钱），让士兵把他们押送到柏林的新哨所大楼，自己却携着 4000 马克 37 分尼的赃款销声匿迹了。

十天之后“克佩尼克上尉”的真相被揭露了，然后被逮捕，而且被立即送上了法庭，为缉拿他，波茨坦的行政专区主席和克佩尼克的高级官员曾经分别悬赏 2000 马克和 500 马克。这次，法院判他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罪、诈骗罪、伪造证件罪、未经授权私自操纵公共职务罪以及未经允许擅自穿戴军服罪，服有期徒刑四年。

他的生活似乎还是没有丝毫的改变；因为即使服完了刑，他又能干些其它的什么事呢？他仿佛已经走不出这个恶性循环的怪圈了。然而，还在这次审判过程中就已经可以看到一些新情况了。平生第一次，受尽屈辱的威廉·福尔特成了公众人物，平生第一次他得到了承认。报纸在报道他，有人给他往监狱里送礼物，写信夸他，给他捐钱，向他求婚。就连皇帝威廉二世也表示

关注：“这就叫做纪律严明，这方面无人可以企及我们。”为普鲁士士兵的纪律严明而自豪，而当时克佩尼克诈骗案正令全世界发笑。20个月后他批准了福尔特的赦免申请，于是这个“上尉”的刑期就减短了28个月。

威廉·福尔特在离开特格尔监狱的时候，已经立于他生命的第六十个年头。服刑期间人们没有忘记他。出狱的时候在大门口有许多好奇的人，甚至许多摄影家在等着他。人们对着他欢呼，记者争相采访他。柏林的一家报社为他召集观众开大会，会上，大家为这位“克佩尼克的上尉”捐赠了大约2000马克。这一切对六十岁的福尔特来说似乎意味着“呼唤他开始重新做人”。不管怎样他在给皇帝的感谢信中是这么写的：

“最最有威力的陛下！最最尊敬的殿下！最最宽容大量的皇帝，国王和君主！陛下！最最宽容大量的陛下以仁慈和宽容，用我不曾奢望的善意送给了我一件不敢恳求以至不能理解的礼物。对我来说，陛下的赦免不只缩短了我的服刑

期,而且唤醒了我重新做人的信念。陛下将令我的老年比我的童年更幸福。只有像我这样虚度了一生(即使虚度是由我个人造成)并因此而深感内疚的人,才能体会到陛下对我的赦免意味着什么。也许我只能用平白的语言来感谢陛下,但是我希望也恳求陛下相信我的感谢是善意的,纯真的。请陛下以后也把我看作最最宽宏大量的陛下手下最最忠实的臣民威廉·福格特。”

出狱之后五天,威廉·福格特赶往基尔,由克佩尼克诈骗案而编成的滑稽剧即将在那里上演。该剧的名称就叫做《克佩尼克的上尉》,威廉·福格特想亲眼看看这部剧。可是虽然他已经跳出了恶性循环的生活圈,但对警察来说,他还是个威胁。因此他不可在开场的时候在观众席就座。他只能待在特定的区域之内,而且他还得遵守一项明文规定,即他的逗留不能引发成他的个人展示会。但是事态的发展不可阻挡,他的出现最终还是演变成了他的个人展示会;观众济济一堂。成千上万的人想看看“克佩尼克上尉”的真面目。

这里面隐藏着商机,几天后,它就在汉堡得到利用。福格特想在这个汉莎城市拜访他的一个姐妹,他有两个姐妹,已经42年没见面了。一个饭店店主,巴姆贝克“老射手苑”的老板听说这件事后,就邀请威廉·福格特到他的店里下榻。福格特接受邀请后,店主马上在报上刊登了下面一则广告:

“威廉·福格特先生,又称克佩尼克上尉,将于星期天,即9月6日一整天到本店拜访。上午11点半到1点半:音乐酒会。下午从3点钟开始:大型花园音乐会。晚上:舞会,还有大量绚丽的烟花。入场费每人60分尼。”

汉堡的警察局也紧张起来。他们让威廉·福格特前来听审。根据现存于汉堡国家档案馆的档案记录,福格特当时申辩说:“我并没有想要展示自己。”但是现在,不管这是不是他的意图——汉堡人也想见他一面。他来的时候,他们——据后来的《汉堡外报》报道——在街道上挤了个水泄不通;在巴姆贝克“老射手苑”门前,警察局“安排了比平时多一倍的警卫人员站岗

并组织人力维护安全。他们严禁举行舞会,严禁燃放烟火,所以‘上尉’在汉堡的亮相没能在噼啪的爆竹声中结束。”威廉·福格特不反对别人拍他的照片,照片火速被做成了明信片,以每张30分尼的价格出售,若有需求,上面还可以带有“上尉”的亲笔署名。明信片上写着:“威廉·福格特,又称克佩尼克上尉。”

这为不久以后获利非浅的明信片生意开了个头。后来人们把明信片的销售活动安排得更好了,而且规模也更大了。只有一次,1909年2月,出现了一点情况。恰好在威廉·福格特六十岁生日那天,波恩的陪审法庭告他非法销售明信片,处以罚款288马克。这是他长长的犯罪记录里的最后一桩记录。从那以后,明信片的生意正式上路了,而且有销售许可证担保。几乎在德国的每个城市都留下了这个六旬老头的影子。他的“出场”很简单:在饭店里,通常是在饭店的大厅里,找张桌子坐下,殷勤地回答来访者的提问,介绍他的生活经历,并在人们买下的明信片上签名。

卡尔·楚格迈尔还经历过福格特的这类场景,后者后来帮他赢得了持续的世界声誉。1966年楚格迈尔写信给我说,“我还是个美因兹的男孩时,在狂欢节上——我想,那是在1909年或1910年——驾着轻便的马车,载着有名的福格特穿行于市内,我看到了他仁慈地向大家行军礼。然后他穿着军装坐在饭店里,为他的明信片签名并把明信片卖出去,很会做生意。这次销售又招来了驱逐之祸,黑森州的大公爵把他驱逐出境。我现在还有关于此事的公文,警察局文件的复印件。不过这次驱逐对他来说无关痛痒,他在其它的小地方继续卖他的明信片……”

六旬的福格特在明信片上的形象各不相同。有几张穿着戎装,有几张则穿着便服,例如穿着黑色的小礼服,白色的马夹,戴着粗粗的怀表链。如果把这些照片跟1906年警方给他拍的照片相比,人们会发现,生活方式的转折是如何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外表。当年他只是一个轮廓干瘪、弯腰弓背、颧骨突出、神色鬼祟的小男人,而今他则成了身材魁梧、又高又大的花甲之人。

许多人都说：“我也会相信他是个上尉。”

对这个男人，官方的态度也越来越友好了。1911年普鲁士的内务部长发了一封通函，内容如下：“内务部长通知，对于警察局采取尽可能温和的监督方式处理这一情况不必抱有疑虑，尤其是在福格特申请居留权的事项上不得有任何苛求。”

可见他用军事手段达到一定目的的点子是有道理的。无论如何在德国是这样。然而在国外，当他想在那儿拓展这种利润丰厚的“巡回演出活动”时，官方对他的反应非常冷淡。在荷兰他被捕了，并被押送回了德国。同样在法国他也没碰上好运。自1870/71年以来，法国人对普鲁士的所有行动都警惕至了极点，他们非常果断地禁止曾经是囚徒的福格特向他们展示普鲁士王朝军服的威力。因为这正是年上花甲的福格特想出的好主意：不像在家乡身着便服，而是穿上普鲁士上尉的军服出场会尤其吸引人。

但在美国他得逞了，在此之前他还到过瑞士和卢森堡。不过在美国他遇到了其它问题：美

国移民局讨厌他有犯罪前科。幸运的是,他可以从加拿大偷渡到美利坚合众国。

在这段时间里,德国人并没有忘记克佩尼克的上尉。相反的,他的名气越来越大。因为在1909年他就写了一本小书,153页厚,是他的自传:《我是怎样成为克佩尼克上尉的。我的生活经历/作者:威廉·福格特,又称克佩尼克上尉。》这本书卖得非常好。

他在书中解释了他采取这一行动的原因:他想通过暴力在克佩尼克市政府里搞到那份人们长久以来拒发的证件,即他的居留许可权。但是这次冒险没能达到这个目的,因为克佩尼克市政府没有护照签发处。他本来觉得抢不抢财务处无所谓。虽然他给出纳员下了封闭保险箱的命令,但是是出纳员怂恿了他接管保险箱:“我很惊奇,因为我一个字也没说,甚至连一个音也没发,说我想接管金库。若不是送上门来的请求,保险箱现在还可能安静地留在克佩尼克……不过出纳员向我走来,交给我保险箱的钥匙,保险箱的门已打开,说:‘上尉先生,这里

还有属于克佩尼克市政府的两百万。’——于是我转向我的两个特种步兵,说,‘你们听到了,这里有两百万钱。这与我无关。’——我亲自关起保险箱的门,将它锁上。如果我是为着钱的目的到克佩尼克,然后放着两百万不拿,只拿了其中的4000马克,那么我未免也做得太幼稚了点。有人说,这些钱是公债券,这种反驳对我来说毫无用处,因为即使是偷来的有价证券,人们也可以在邻国以优惠的价格轻松地把它兑换成其它货币,我有足够的经验去完成这种交易。”

靠那本书和出场表现,年届六旬的威廉·福格特赚了很多钱,不久他就有足够的钱在卢森堡买一幢房子了,那个地方的人愿意接纳他。六十五岁的时候他转而过宁静的生活,靠他的积蓄还活了好些年,直至1922年1月4日去世。



巴勃罗·毕加索

Pablo Picasso

1881—1973

“噢，我这么做只是出于好玩。我知道，这些东西没有任何意义……”

敏感而又迷信的艺术天才

——毕加索

巴勃罗·毕加索：西班牙画家，雕刻家，立体主义画派主要代表，对20世纪现代艺术的发展作出非凡贡献。代表作有油画《格尔尼卡》、《亚威农的少女》、宣传画《和平鸽》等。

巴勃罗·毕加索，1881年10月25日出生在西班牙的马拉加，到了花甲之年，他决定加入法国共产党。那是在1944年的夏天，当时毕加索六十二岁。几个星期前德国人又一次被法国人赶出了巴黎。毕加索自始至终都是反法西斯主义者，在法国抵抗运动的战士中，他有许多朋友，他们在大战中反抗德国侵略。尽管如此，毕加索加入共产党的这一举动还是引起了世人不少的关注。为了向公众澄清他加入共产党的动机，他接受了一次采访，采访录于1944年10

月,几乎同时在巴黎和纽约发表。在采访录中,毕加索说:

“我加入共产党是我整个人生的逻辑延续。因为我可以自豪地说,没有一次我把绘画看成是一门自我消遣的艺术,一门消磨时间的艺术。相反地,画笔和颜料是我的武器,我一直都想凭借这些武器更深刻地描绘出对世界和人类的认识,让这些认识日渐解放我们……这几年的恐怖镇压使我醒悟到,我不应该只用艺术这一武器,而应该用我的整个存在参加斗争。”

在采访里他首先谈到了抗战中的朋友,这些朋友早就知道了他的信念;他逐字逐句地说:“我很在乎找到一个新的故乡。过去我始终是一个流放者,但现在我不是了。在西班牙人痛改前非欢迎我回去之前,法国的共产党就已经向我张开了双臂,在他们的队伍里我遇到了我最欣赏的人:最伟大的科学家,最伟大的诗人,还有法国起义军可爱的面孔,在八月的时候我就看到了这些面孔;我又回到了兄弟之中。”

六旬的毕加索留有一头相当长的头发。在

1944 年与毕加索邂逅后，保罗·埃洛德这样描写他：“我买东西回来，在雅各布大街上碰上了毕加索……他长发披肩。白花花的。脸还很嫩，丝毫没有老翁的迹象。但是从后面看，他无疑已是个老翁了。很难想象。以前我从来没注意到过，他原来是这么矮小……”

那时毕加索跟比他小得多的弗朗西斯·吉洛特住在一起，她先是当他的模特和学生，其后和他生了儿子克洛德和女儿帕洛玛。她陪他一起生活了十年，然后离开了他。后来她写了《与毕加索一起的生活》一书，毕加索觉得这是对他生活的赤裸裸地揭露，而且揭露的方式让人无法忍受，情况也不符合实际，为此他向法律投诉了这本书的不法。然而结果适得其反，这本书反而更出名了。弗朗西斯也写到了毕加索的长发，但是她说，毕加索留长发是因为他害怕理发：

“一直以来他都很讨厌理发，他习惯于整个月拖着过长的头发在街上打转，却始终下不了走进理发室的决心。因此只要有人提到这个话

题,便会有一出好戏可看。”

弗朗西斯为此做了解释:“我相信,他的脑子里肯定有种封建的思想,认为头发是男人力量的象征——就像《圣经》里参孙和大利拉的故事——而且这种思想是和其它的顾虑连在一起的。胡子对他来说不成问题:他每天都刮胡子,可以自行解决。可头发长得越长,他就越担忧自己的窘相。通常到最后他让我帮他剪,有时候他躲在寂静的小房间里自己剪,——每次剪出来的效果都很不一样。——有一天他结识了一个名叫阿里亚斯的西班牙理发师,他觉得他可以信任这个男人。从那以后,如果剪发的事不能再拖了,他就让阿里亚斯过来……”

毕加索害怕剪头发是否真的因为,像弗朗西斯猜测的那样,他的封建迷信思想在作祟,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暂时搁在一边。不可否认的是,毕加索非常迷信,对此,弗朗西斯还能举出一大堆例子。例如:“如果我把他的帽子扔在床上,我经常那样做,那么这不是简单地意味着他的帽子没放好,而是意味着,年终之前这幢房子里会

死人。有一天我俩在相互开玩笑,当时,我在房间里打开了一把伞。这下不好了,我们不得不把两手中指交叉叠到食指上,然后在房间里来回走动,同时不停地抖动双臂,喊着‘壁虎!壁虎!’这样我们才可以赶在晦气逮到我们当中的某个人之前把晦气赶出家门。——另外,放面包也有规矩:面包圆的一面必须朝上放在桌子上,从来不可以马虎,否则我们就可能遭遇不幸。”

弗朗西斯在书中还举了另一个生动的例子,说明毕加索的迷信:“每次我们要动身去郊游的时候,不管郊游的时间是多么的短,我们必须先完成俄国的一个习俗,根据这个习俗,家庭所有成员都必须先在出门的那个房间里至少静坐两分钟,不准说一个字。之后我们才可以放心去郊游,不必担心郊游的过程中会碰上什么意外——我们大家都跟着做,表情严肃到了极点。如果习俗结束之前孩子中有人笑了或说话了,我们必须从头再做,不然的话他就拒绝走出这个家门。”



他真的相信这些东西吗？毕加索自己说：“噢，我这么做只是出于好玩。我知道，这些东西没有任何意义……”但是他又小心谨慎地坚持这样一个观点：人们没法断定，这么做到底是好是坏，如果是好，好在哪儿。

弗朗西斯写了一本确实很主观的书。按照她的说法，年届六旬的毕加索终日杞人忧天，担心自己会生病，尤其担心自己会得癌症。“睡觉醒来，他总是觉得活腻了，于是开始执行他的一套程序，开始一阵子喋喋不休，每天重复，有时很认真地，有时又马虎些。”弗朗西斯写道。毕加索躺在或者坐在他的黄铜床上。“他的上面晃动着一个没有灯罩的灯泡，床的后面挂着他最喜欢的画，画挂在衣夹上，衣夹定在墙上。有些所谓的比较重要的信件，他虽然也不回，却要作为不可忘却的警告和责难一直放在眼前，他也同样用夹子把它们夹起来，挂在金属丝上，挂东西用的金属丝一直从电灯这一端拉到炉膛那一头……首先是保姆端着早餐和要吃的药进来……其次是秘书拿着报纸和信件进来……我

垫后……然后他就开始抱怨了：

‘你不知道我有多么的不幸。没有人会比我更不幸了。而且我是个病人。我的上帝，如果你知道我有怎样的痛苦。’”弗朗西斯认为，虽然他时不时犯胃病——二十年后，即他84岁那年，他到医院开过刀——但是病情仅此而已。然而“他又继续唠叨：‘我有胃病，我想是胃癌。可没有人关心这件事。古特曼医生本来应该对我的胃负责，可他几乎不管我。’”古特曼是毕加索的医生，毕加索觉得他太不重视自己了：“‘如果他还有那么一点点关心我的话，他现在应该待在这里。他自己说他每天都会来，但是他没有。我去找他的时候他说：‘我的朋友，您的病情没有您想象的那么坏。’然后他怎么做呢？他给我几本刚出版的书。我应该看他出版的书，这有必要吗？我需要的是一个关心我的医生……你也许能告诉我，这样我的身体怎么能好？我的心已经枯萎。我很不幸，这没啥奇怪的。没有人理解我。不过话又说回来，他们怎能理解我呢？大部分的人都是那么的愚蠢。我能跟谁谈心呢？总而

言之——生活是一种恐怖的负担……”

他就这样日复一日地抱怨着，而且每次都会责怪家人：“我工作得一天不如一天。如果工作的时候还得生家人的气，那么做不好工作还是件怪事吗？”他是在说他的第一任妻子，曾经是舞蹈家的欧尔迦·柯可洛娃，一个俄国女子。他俩生了儿子保罗。他们已分居十年了，但他还没有放弃她，就像他永远不会放弃曾经是属于他的任何一样东西，不管是物还是人。

“‘又是一封欧尔迦的信，’”他继续唠叨。“‘她不让人有一天的安宁。保罗又跟人家发生争执了。明天的情况可能更糟。说不定什么地方就会跑出个人来破坏我的生活。只要想想这些会没完没了地下去，日复一日，而且越来越糟——你还会惊讶于我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吗？所以，我绝望了。我几乎已经绝望了。我为什么要起床？我将再也不起床了。我为什么要工作？我为什么还要活下去？像我这样的生活几乎忍无可忍。’

这时该轮到我了：‘不，’我说。‘你根本没

病。当然你的胃会给你带来一些麻烦。但这确实不是件严重的事。而且你的医生待你很好。’——但是他接着开始朝我怒吼：‘是的，你说的没错！他也说，我可以喝威士忌！他就这样来关心我！他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

‘你说什么呢？他之所以让你喝酒是因为他想，喝酒可以给你带来乐趣。’

‘啊，原来是这样！我懂了！尽管如此，我还是不会喝一滴酒。说不定一切会因此变得更糟。’”

弗朗西斯只能劝他，他确实用不着生那么大的气，他的朋友都真诚地喜欢他，他的工作干得相当出色，而且他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要阐释完所有鼓舞他的论据经常需要一个小时——论据说完了，我也筋疲力尽了。这时他开始在床上懒洋洋地舒展四肢，好像此时他愿意跟这个世界和平共处了。‘你说的可能有道理。也许情况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么糟。但是你相信你说的话是真的吗？你确信吗？’

‘是的，是的，当然是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没

有其它的可能了。毕竟还是取决于你自己是否动手去做。其实你心里很清楚,你可以凭借你的艺术来改变事态。我确信,你今天会开始着手做一件杰出的艺术品。今天晚上,等你完工后,你就会觉得我说的话没错了。到那时,整个世界会以另一种模样呈现在你眼前。’……

于是他就起床了,按照惯例依次向在座的各位打招呼,一会儿跟这个朋友聊几句,一会儿跟那个朋友诉几句苦,这些人习惯在吃饭之前到我们家来聚一聚。——等到吃完饭,他已把生活的一切痛楚抛到了九霄云外。从两点钟开始他就只想着他的工作了。除了晚饭的时候稍微休息一下外,他只知道工作,直到深夜两点……只是——到了第二天,一切又从头开始。”

对于六旬的毕加索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恐惧,人们很可能只会采取嘲笑的态度,但这未免太简单了一点。毕加索当时其实还是一个年轻人——这是对于他九十一岁半的寿命来说的,他在1973年4月8日去世——这一点,年届花甲的他毕竟还无法知道。



奥托·冯·俾斯麦

Otto von Bismark

1815—1898

“感谢殿下今年仁慈地
把皇家马棚里的马匹提供
给我使用。在本地接受沐浴
治疗后我慢慢地但不断地
康复了,我看到了痊愈的希
望。……”

这里很美

——俾斯麦

奥托·冯·俾斯麦：普鲁士王国首相，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宰相，著名的“铁血宰相”。他通过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改革，使普鲁士王国迅速强大，并在普法战争中获胜，最终使德国统一。

花甲之年的奥托·冯·俾斯麦也有忧虑和某些烦恼，当时他正担任几年前自己亲手建立的第二帝国的首相。他在柏林迎来了六十岁生日，即1875年4月1日，那天晚上，他给奥古斯塔皇后，威廉一世的夫人，写了一张表示感谢的便条，言语甚是谦卑。奥古斯塔对俾斯麦的政策早就心怀疑虑，甚至经常设法阻止其政策的推行，俾斯麦因此无法忍受她。便条的内容如下：

“作为最忠实的臣民，我恳请皇后和国后陛下仁慈地接受我最衷心的感谢，感谢至高无上

的陛下托侍女哈克尔伯爵夫人给我传达了生日的祝福。因为病后有晚起的习惯,所以我当时没法立刻起床并亲自向哈克尔夫人表达我对陛下的仁慈和厚爱的感激之情,在此请允许我附上歉意之词。”

从中可以看出,即使在六十岁生日那天,俾斯麦也是照样躺到中午才起床。这已是他很久以来的习惯了。显然,在取得了“文化斗争”的胜利并开始导演“战争在即危机”的时候,花甲之年的俾斯麦身体并不是太好。

生日那天晚上,男爵夫人希尔德加德·冯·施皮策姆贝格也在俾斯麦家拜访。在她记述 1865 年至 1914 年霍恩佐伦家族皇宫的著名日记里,她也写到了俾斯麦的生日礼物:“在桌球房里堆满了数不胜数的礼物,它们来自各个领邦,来自各个阶层:硕大的花束和花篮、盆景、果实、烈酒、啤酒和葡萄酒,各种各样的水果,还有画作和诗作,柜子和桌子,简直就是个年市!其中的一些礼物光彩耀人,一些则朴素至极,一些非常漂亮,一些则毫无品味。总共收到 650 封贺电,这很好地

说明了整个民族对他的爱戴和感激之情。”

年届六旬的俾斯麦觉得身体不适，必有很多缘由。当时和沙皇一道来到柏林的俄国首相举了其中的两个原因，确切地说是三个。他说：“俾斯麦病了，因为他吃得太多了，喝得太多了，工作得太多了。”六十五六岁时，俾斯麦在一封私人信件里说：“在上帝的恩赐下，我的家人还健康活着，我的女儿给我添了两个外孙，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过得很好；可惜我的儿子们还没有结婚；赫伯特在驻伦敦的使馆工作；小儿子在我手下工作；谢天谢地，他们都还健康。可是我妻子的身体已不能用‘健康’来形容了，对我，就更不要提这两个字了；我不再去打猎了，马也骑得很少，因为身体太虚弱了，如果我不马上退出政坛，我的生命力将消耗殆尽……”

俾斯麦经常因剧烈的面部神经痛而苦不堪言。1876年3月18日施皮策姆贝格男爵夫人在日记里这样描写快到六十一岁的俾斯麦：“侯爵头痛得厉害，他的妻子因此整天站在他身后，在他冰冷的额头上压一个柠檬——场面又感人

又好笑。”

不久之前，俾斯麦向他年长 18 岁的皇帝和主子正式申请辞职。可威廉一世在辞职信的边缘空白处写上了“永不可能！”四个字。不过他也作了让步，即俾斯麦可以无限制地度假。六旬的俾斯麦于是经常利用这一特殊待遇。从那以后，他一年中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弗里德里希鲁度过的，那是他在汉堡附近萨克森森林里的庄园，是皇帝赐给他的。而从此，他的反对派说，“首相专政”时期正式开始了。因为俾斯麦长期不在柏林，这给各部的工作增加了相当大的难度；他如果不在，什么事都办不成，而帝国的宪法又不允许选代理首相。

弗里德里希鲁远离柏林，六旬的俾斯麦可以以私人身份出入这个庄园，在那里他经常觉得过得很舒适。他去散步，有时也出去骑马，但骑马对他来说——像施皮策姆贝格男爵夫人在 1880 年 12 月 4 日所记录的那样——不是件没有危险的事：“我们两点钟吃饭，四点钟坐快车到弗里德里希鲁，这是俾斯麦家用来招待客人

的地方。侯爵夫人和兰曹夫妇以最热情的方式迎接我们,接着出来的是哈尔贝特,最后出来的才是侯爵,穿着伦巴赫式的便服,外面套着黑式礼服大衣,戴着高高的白色衬领。他看起来心情很好,甚至可以说非常愉快,脸上没有浮肿,尽管如此他还是抱怨四肢疼痛,等到侯爵夫人出去,他就偷偷地告诉我们,他跟他妻子讲,四肢疼痛是由感冒引起的,实际上是因为几天前他从马背上摔下来了:天已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他们骑着马,走在森林里,这时,伯爵的马踩进了一个坑里,侯爵翻身从马背上摔了下来,撞到了一棵紫堇树上;沉沉的马匹压在这个同样是沉沉的男人身上,而侯爵竟然没有因此而伤筋动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同样是沉沉的男人”:因为俾斯麦当时重约 2.5 公担,准确地说是 245 斤。餐桌上,俾斯麦从来都是毫无顾忌地吃。客人们总是惊讶于他早餐就能吃下那么多肉。不过他经常到中午 1 点左右才吃早餐,因为他——前面已讲过——工作到深夜之后,第二天老是睡得很晚才起床。

在弗里德里希鲁的早餐桌上通常有大量的冷冻油炸食品、酥皮点心、蛋制品、鱼子酱、熏鱼，俾斯麦不停地伸手夹菜，边吃边喝混了白兰地和波尔多葡萄酒的矿泉水。

这样会影响他的健康，这一点不足为奇。他经常受到医生的告诫，但是他觉得医生也起不了什么作用，至于医生的建议，他就更不愿意采纳了。直到1883年，六十七岁的他向慕尼黑的医生恩斯特·施韦尼格讨教的时候，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他相信施韦尼格，因为施韦尼格成功地医治了他儿子比尔的病。比尔(原名威廉)·俾斯麦三十岁的时候就已经胖得不行了，人们怀疑不久以后他只能坐着轮椅行动。施韦尼格医生给他规定了饮食，比尔也遵循了这一规定，一年后比尔·俾斯麦减了六十斤。于是侯爵也准备按照这一规定饮食。施皮策姆贝格亲眼目睹了饮食训练不幸的起始阶段或者说失败阶段：

“巨人按照规定的饮食量吃了八天，感觉身体有了明显的好转；这以后他一下子喝了四升脱脂乳，接着又喝白兰地，结果惨遭消化不良之

苦，胃又胀又疼，呕吐不止。更苦的则是可怜的侯爵夫人，整日哭哭啼啼，这更加重了侯爵心中的郁闷，以致于医生和孩子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刚开始实行“饥饿疗法”的时候，除了施韦尼格医生，俾斯麦还有另一个医生，即弗雷里希斯医生，他——据男爵夫人说——“给侯爵胡乱治了很久的病，结果搞得侯爵的病情越来越严重”。治疗了三个星期之后，男爵夫人又到了俾斯麦家，然后记下了以下文字：

“中午我在俾斯麦家吃饭，在座的还有比尔、兰曹夫妇、艾特施泰特夫妇、荷尔斯泰因夫妇和施韦尼格；吃完饭后，我们要么坐在阳台上，要么在花园的丝绒地毯上来回走动。但是俾斯麦一家人却很沮丧，因为侯爵不愿接受施韦尼格的治疗，他不肯甩掉弗雷里希斯，所以就随心所欲地执行两种疗法中他喜欢的那些规定。儿子们很愤怒，侯爵夫人则很伤心——这种场景让我想起了我们家中做爸爸的那一位，他像侯爵一样到了不愿接受别人的建议和告诫的年

龄，但是稍有不舒服，他又会马上打电话给医生。施韦尼格预测了通常的结果，俾斯麦如果吃得过多，肠胃将因为不堪重负而继续扩张，这个预言让可怜的家人深感不幸。”男爵夫人补充说：“一旦意志被摧毁，就会显得多么的渺小、多么的微弱，对于一个伟大的男人来说，这真的很惨。看到这种结局，人们也会很伤心。就这样这些倔强的‘雄狮’用世人和命运未曾给予的荆条缚住了自己的手脚！”

不过最后俾斯麦还是选择了施韦尼格。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把施韦尼格带到了弗里德里希鲁，从此施韦尼格日夜守候在这位病人身旁。根据饮食规定治疗了几个月后，俾斯麦只重195斤了。期间他已经六十八岁了；比起刚步入六旬的几年，他觉得现在过得好多了，那时的他甚至递上了辞职报告。为了彻底康复，1883年夏天和秋天他继续在巴伐利亚的基辛恩和奥地利的加斯坦恩接受治疗。他从基辛恩给巴伐利亚的国王路德维希二世写了一封贺信，祝贺他三十八岁生日。在信中他同时表达了对国王



Linnaeus 1758

的感激之情，“感谢殿下今年仁慈地把皇家马棚里的马匹提供给我使用。”至于自己的情况，他向巴伐利亚的国王汇报如下：

“在本地接受沐浴治疗后我慢慢地但不断地康复了，我看到了痊愈的希望。我首先要感谢医术高超的施韦尼格医生，他有能力做殿下忠实的臣民……”

俾斯麦确实坚信，只有在施韦尼格的帮助下，他的病才会好到这个地步。他也把这事告诉了威廉皇帝，于是皇帝亲自出马，让柏林大学医学院将施韦尼格任命为教授——尽管俾斯麦多年的政治对手、为人称道的病理专家鲁道夫·魏尔肖医生极力反对。施韦尼格改变了俾斯麦的整个生活节奏，这当然不只影响到了俾斯麦一家人，而且也影响了俾斯麦家常客。施皮策姆贝格在1885年年底再次拜访俾斯麦后，把这一情况也写了下来：

“下午我坐车去弗里德里希鲁……亲爱的俾斯麦家人对我们的迎接总是那么热情、那么真挚……俾斯麦像父亲一样把我拥在怀里，吻了

我,在他身上已经看不出今年春天时那又笨又胖的痕迹了;侯爵的形象让我想起了他壮年后期的一些情景,他穿着紧身的黑色长大衣,戴着高高的衬领,步履轻盈地走来,个儿瘦瘦的,简直像个年轻人,自然头发已经花白,脸由于消瘦而显出了满脸的皱纹。我那善良的侯爵夫人看起来却很可怜,她正在闹不间断性头疼;她吃得很少,所以越来越瘦,像她的丈夫一样过了一个夏天就轻了40斤,虚弱得要命,只是依旧像往常一样没有片刻的休息,整天操劳忙碌。兰曹夫妇也试了施韦尼格的疗法,结果也变‘瘦’了;侯爵7点钟起床,出去散会儿步,9点半吃早饭,有鸡蛋和火腿肉,按照惯例一边吃一边定计划,12点跟家人一起吃饭,然后坐车或者走路出去玩玩,直至天黑才回家,通常6点钟吃完晚饭后他还到花园里走一圈,9点或9点半上床睡觉,而客人和家人直到12点或12点半还围坐在一起谈笑风生……”男爵夫人说,这段时间内俾斯麦“极度快乐、幽默和激动”,她用这句话结束了她的日记。

早年的时候,俾斯麦经常渴望辞职,渴望退

出政治舞台,过退休的生活,而在接近古稀之年的时候,他再也不去考虑这件事了。相反地,他认为他还可以继续工作几年,这样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掌握德国和整个欧洲的命运。大家也相信他有能力完成这项事业。减肥计划完成之后,六十八岁的他重新在柏林抛头露面,当时他的同事弗里德里希·冯·霍夫施坦因评价说:“他工作能力强,好斗。”

几个星期后——这时他六十九岁了——他从弗里德里希鲁写信给留在柏林的妻子,这次他又在弗里德里希鲁隐退了几个星期:“这里很美,虽然丁香和橡树比柏林的分别晚了3天和6天开花。荆棘丛的花期和柏林的是一样的。没有夜莺,但有不计其数的篱雀、小鸟以及诸如叫杜鹃的这类东西,我在柏林还没听过杜鹃的叫声。我问它,还要叫多长时间?这位献媚者答道:12天,不过最后两天声音会比较微弱……”

这是在1884年5月。俾斯麦六十九岁。他的前面还有14个春秋,其中有十年是跟他的妻子一起度过的。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
正文